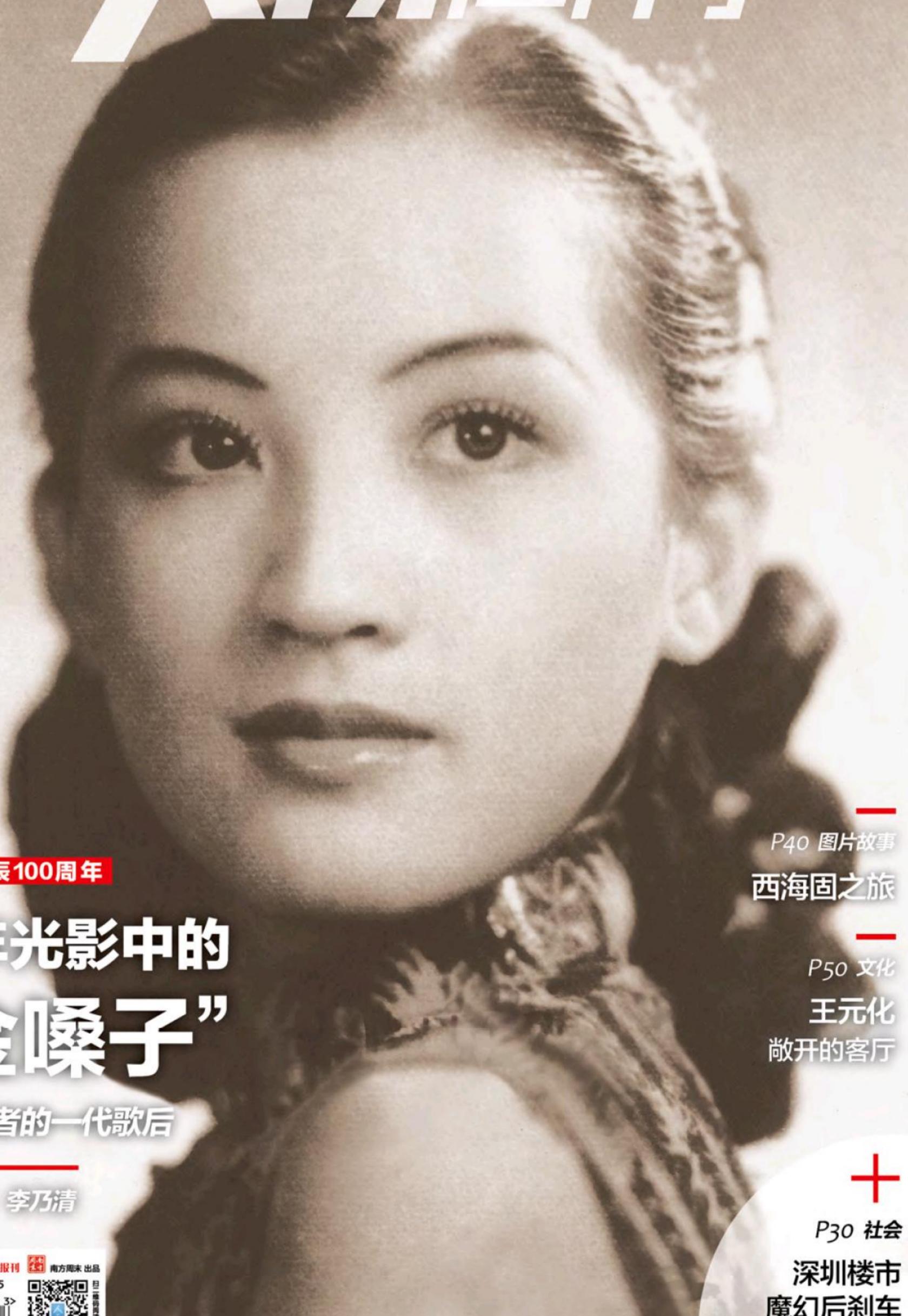


南方

# 人物周刊



周璇诞辰100周年

## 百年光影中的 “金嗓子”

后无来者的一代歌后

本刊记者 李乃清

P40 图片故事  
西海固之旅

P50 文化  
王元化  
敞开的客厅

+

P30 社会  
深圳楼市  
魔幻后刹车

中国邮政发行情报网 南方周末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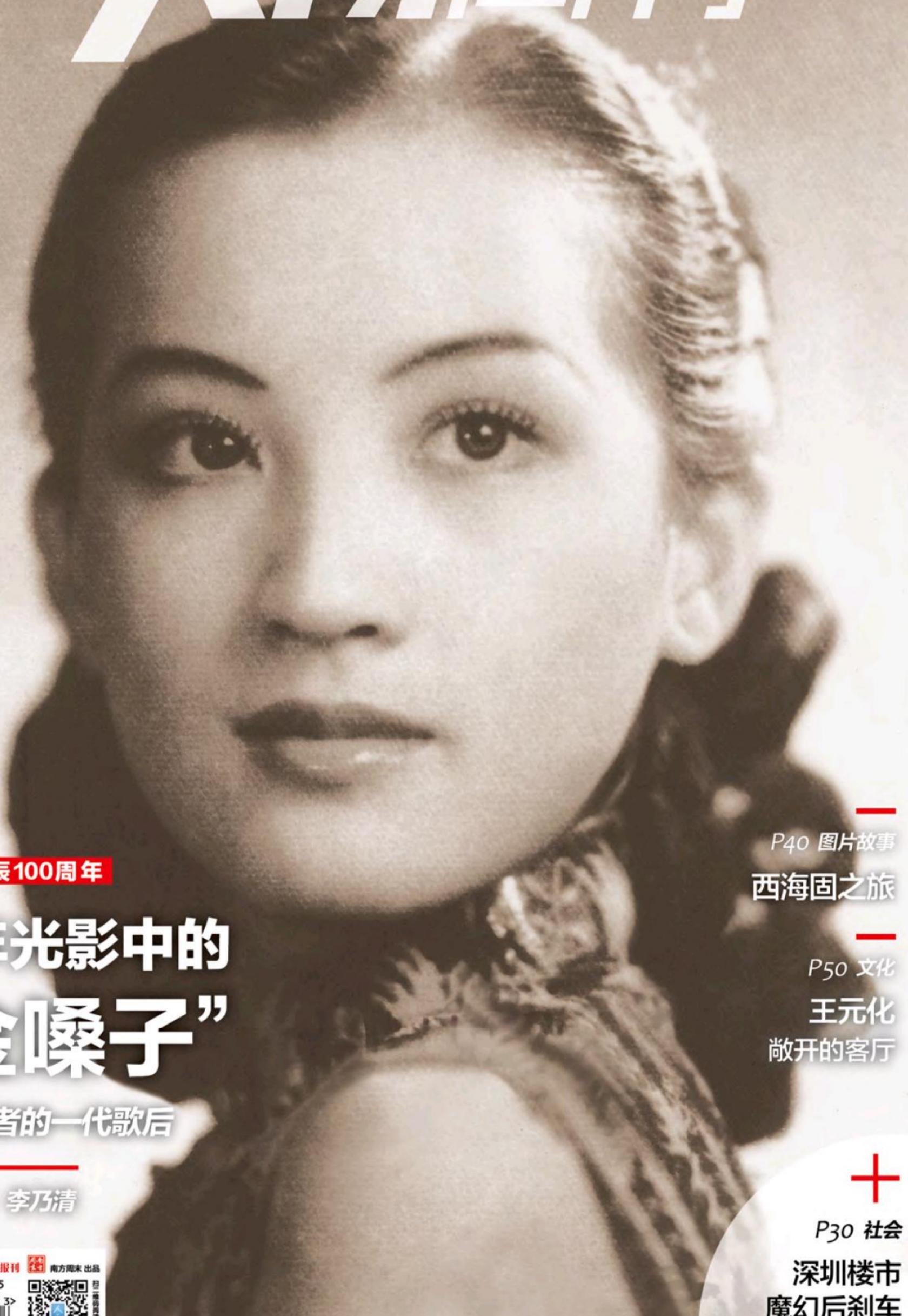
ISSN 1672-8335

9 771672 833203

2.30

南方

# 人物周刊



周璇诞辰100周年

## 百年光影中的 “金嗓子”

后无来者的一代歌后

本刊记者 李乃清

P40 图片故事  
西海固之旅

P50 文化  
王元化  
敞开的客厅

+

P30 社会  
深圳楼市  
魔幻后刹车

中国邮政发行情报网 南方周末出品

ISSN 1672-8335

9 771672 833203

2.30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 440100190045  
价格 定价10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主编 王巍  
副主编(常务) 杨和平  
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卫毅  
编辑部主任 周建平  
总主笔 蒯乐昊 李宗陶  
高级主笔 徐梅 徐琳玲 邓郁  
主笔 李乃清 王燕青 黄剑  
资深记者 张明萌 邱苑婷  
记者 陈洋 王小祥 张宇欣  
孟依依 赵蕾 杨楠  
编辑 孙凌宇 杨静茹  
首席摄影 姜晓明  
高级摄影 大食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资深图片编辑 郑洁  
资深校对 赵立宇  
资深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邮编 510601  
传真 020-87370368  
E-mail renwzk@163.com  
北京联络处 13910128123  
上海联络处 13661513938  
广州联络处 020-87371912  
成都联络处 028-86981533

本刊部分图片由 Getty / VCG / IC / Fotoe / Panos / Osports 提供

####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500-1000元/千字;
  -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1500元/张以上;
-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020-87001145  
E-mail yjyfnzm@126.com

总经理 姚伟新  
副总经理 孟登科 杨子  
总经理助理 王海荣 袁宇 李佩佩  
特别顾问 杨昌玉

运营中心华东区总经理 王海荣(兼)  
成员 董一扬 王理晖 张艺颖 徐斌 金沈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婷  
副总经理 邓媛元  
成员 张津阁 于琦 过申祥 刘晓梅 王婷婷 张浩森

运营中心华南区总经理 袁宇(兼)  
成员 廖颖 韦秋萍 陈晓微 余希桐 张力  
梁嘉敏 江喜 柯晓露 徐子敬

运营中心西南区  
成员 李勋 曾宪实 侍玉宝

品牌中心  
总监 李佩佩(兼)  
成员 凌亚 林周 黄河颂 魏运星 蓝鑫焱 王琳  
郑永金 陆谢涛 刘籽欣 肖亮

全媒体服务中心  
总监 谢仇辉  
成员 华东 刘璇 邱晓艺 钟楚楚 董颖 洪梦玥 朱奇瑞  
华北 陈婷 任亚强 王明明 裴益玄  
张薇 刘畅 赵宇川  
华南 袁斌 何倩仪 莫燕 刘烨  
黄垚瑶 吴双 况娟  
西南 高泉  
商业内容小组 柯玉圆 郭莹 曾晓君

销售管理部  
总监 黎文渊  
成员 华东 张思韵 华北 项子琪 华南 刘金鑫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崔泽华  
网络总编辑 肖华  
首席技术官 蒲凡

内容部	技术部	运营部
副总监 陈雅峰	总监 张础杰	总监 吴水洁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金城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阅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7385907 北京 010-59540392  
上海 021-20357389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沈阳: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大连环渤海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吉林东联传媒有限公司 15004317981  
郑州:河南宏达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371-86063992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烟台:海天书店 13205351986  
石家庄:石家庄兵行天下书店 13613319399  
成都: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3333009  
重庆: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尚和书店 023-8635961  
昆明: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  
贵阳: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尚和书店 0351-7088915  
南宁: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柳州:尚和书店 0772-3180862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82430796  
武汉:明知书店 027-85497847  
长沙: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尚和书店 0731-84411600  
合肥: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温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江苏省邮局:025-8540671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029-87415811

####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本册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n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npeopleweekly> 



官方APP  
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

# CONTENTS 目录



**12**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百年光影中的“金嗓子”**

——周璇诞辰 100 周年



**30 SOCIETY** 社会  
深圳楼市 魔幻后刹车



**40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西海固之旅



**50 CULTURE** 文化  
王元化 敞开的客厅

**60** 张佳玮的人间烟火

**66** 乒乓世界冠军的知青岁月

**04 VIEWPOINTS** 世界观

**72 SUPPLEMENT** 后窗

**80 COLUMNS** 专栏

## 凡事近看必定另有乾坤

本刊记者 孟依依

这句话是我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中读到的。在江西的第八天想到这句话，让原本焦头烂额写稿的我多少获得了一些动力，虽然这动力不足以抵消一小半的焦虑。

我和同事杨楠到江西之后，同行们一拨拨来了又走，村庄浸泡在水中，水体发臭，但灾后的进展就像静止的水面一样缓慢。我苦于找不到新的节点来框定我的稿子，于是十分怀疑自己这么多天来的采访，以及最后写出的文章值得一看吗？

此时阿特伍德那句话出现，像一根救命稻草。我立马正襟危坐，决定从既定的现状回溯、分解，“重新打量每一个生命”。我想村民的生活不仅仅是损失了多少钱、淹没了多少地、与自己的房子分离多少天这些数字而已。

在江西，我和同事杨楠基本上每天都通电话。她在永修县三角乡跟访水利专家、抢修队，常常到深夜，有一天在水面上暴晒三个小时，几天后我们见面，她的手臂和脖子已经开始脱皮。

但她在三角乡的探索遇到了阻碍，一个五万亩圩堤的决堤和一个千亩圩堤的决堤不是一个性质的事件，能追问更多，但当地对此讳莫如深。她后来在《想回家的人》的留言中写道：溃坝那段是三角乡承建，对三角乡人民十分重要，但属于南昌市新建区的责任段，两地履职担责一直不明确。

我在鄱阳县油墩街镇，荻溪村的决口处也迟迟不见重修，被迫从农活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已经进入到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中，但一定有不妥，尤其是对于长期劳作的人来说，要度过漫长而无所事事的白天是件困难的事。

我也只好整日在村里闲逛，寻找采访对象，

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或者坐船到村子里去看看。水面上最多的是水葫芦，树木露出水面的顶部像孤岛一样，看久了会产生它们正随水流漂浮而去的错觉。

有一个下午，我和黄紫益女儿黄芯琪玩。我太喜欢她了。她跟我讲了一堆秘密、她最好的朋友、她做的梦，带我去认村里每一只狗。我第一次见她，觉得她才9岁，可能还不明白洪水带来了什么改变。大食拍完照给他的朋友看，朋友也说，小姑娘还不懂悲伤。

实际上她很明白。给她拍照那天，她的一个朋友跟家人来领救灾物资，我们在断堤边玩。她的朋友大声地喊：你们家的房子倒了，什么都没了（我想没有恶意）。黄芯琪突然僵住，两只手揪着白色裙子，眼神躲闪，尴尬而局促。

我也很喜欢余叔，到他家住了一个晚上，举着手电筒聊天。他的人生态度是及时行乐，对他人又充满悲悯。他承包了180亩农田，但常常助人，因此农忙时邻居们也愿意帮他。他身上，非常好地呈现了一个人和他的村庄的关系。

天气不错，我、另一位同行和余叔吃完西瓜到三楼露台睡觉，因为太热了睡不着，我听到他两次下楼去给我们点蚊香。

还有街上的张伟姐，送了我一大袋子好吃的豆冲。她很善良，跟我讲，不知如何面对房子倒塌的黄家，怕自己的同情伤到对方自尊，又怕不安慰显得自己冷漠。我差点掉下泪来。你看，在自身难保时，仍然会有人关心别人。

我挺喜欢待在村子里，跟村民多吃几次饭，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年不惜时间和金钱回家参加龙舟赛，为什么觉得在洪水中居住比去安全的区域更体面，为什么说这些话，做那些事。

凡事近看必定另有乾坤。



### 新冠病毒如何使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失去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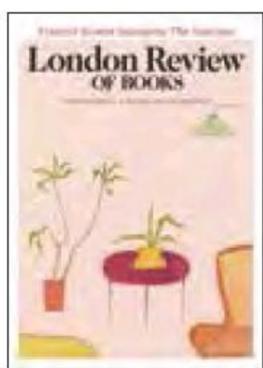
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呈爆炸式增长，经济下滑，作为危机管理者的特朗普遭遇惨败。美国总统要把战争带入美国的城市，以扭转选举局势，这本是前所未有的情况，直到现在。全副武装的匿名联邦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在大街上逮捕示威者。特朗普已派出国土安全部联邦部队到美国西海岸的波特兰，残酷地对在该市抗议了数周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支持者采取行动。联邦部队是高度武装的安全部队，一般用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者。特朗普在所有民调中都远远落后于民主党的挑战者拜登。特朗普说：“我会做些事情。”他想渗透进美国城市，波特兰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总统想转向那些他看到太多暴力犯罪的城市，实际上，这些地方的新冠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但与之斗争是当地警察的工作——他们通常也只在必要时才呼唤联邦部队进行干预。特朗普周三宣布了针对犯罪高发城市的“增兵”行动，他呼吁大规模增加军队以给国家带来和平。数百名联邦官员正进入芝加哥等城市。评论者警告说，白宫中的不安分者及其军队首先在城市中制造混乱，然后充当救星。这看起来像是失败者的最后一战，要想在11月再次当选总统，就必须抱有很大希望，希望有街头暴乱，希望出现奇迹。



【德】《明镜》  
7月25日



【美】《福布斯》  
(亚洲版)7月



【英】《伦敦书评》  
7月30日

### 韩国富豪榜面临洗牌

最近，《福布斯》发布了2020年韩国富豪榜，现年78岁的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位居榜首，李健熙的独子、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排名第4，上榜财富为67亿美元。此外，李健熙长女、新罗酒店总裁李富真和次女、第一毛织执行副总裁李叙显也都上榜，显示三星在韩国的影响力依旧，目前仍然掌控着韩国20%左右的GDP。与此同时，一批来自生物技术、互联网、新零售等新经济领域的富豪已经崛起，这势必对韩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李健熙之下，排名第二的是生物制药巨头Celltrion会长徐廷珍，排名第三的是网游公司Nexon创始人金正宇。此外，社交媒体KaKao创始人金范秀、网游公司Smilegate Holdings权赫彬和NCSoft金泽辰、互联网公司Naver老板李海珍、化妆品企业爱茉莉太平洋老板徐庆培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而且财富增长很快。而从事传统行业的财阀，无论是SK、LG还是现代集团，其掌门人的财富和位次都在下滑。

### 即时反馈的时代

2005年，Reddit网站上线，允许用户转发和评价内容，并依据相关的数据决定内容的权重和排列位置。2008年的美国大选，候选人辩论直播时，屏幕上即时显示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对奥巴马和麦凯恩两位候选人的情绪变化。这种即时的反馈机制被后来的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发扬光大，“喜欢”按钮无处不在，照片、酒店、歌曲、商品、明星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被“喜欢”的数量所左右。可以说，社交媒体时代的人们，时时刻刻在扮演受访者的角色，主动被动地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发表意见：这是一条狗，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特朗普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特朗普和拜登，你准备选哪一个？而这所有的意见都建立在即时的情绪反应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调查之上。那么，用户的选择又从何而来呢？这就给各种广告、情绪操纵、定向推送，甚至造谣抹黑等手法留下了空间，看似自由的选择，实际上是被引导和操纵的结果。

## 硬核贩毒纪录片背后的一对硬核男女

朱江明

近日，知名网络影视公司网飞（Netflix）播出了一部六集纪录片《毒品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Drugs）。该片与过去关于毒品的纪录片完全不同，可以说达到了写实主义风格的极致水平，因此一上映就引得国际观众追捧。

过去很多有关毒品的纪录片往往以人物故事为视角展开，比如展现大毒枭崛起的经历或者底层毒贩的生活故事。而《毒品的生意》其实更类似于一部商业纪实电影，以商业视角揭示毒品交易背后的利益链。

FBI 的数据显示，全球非法毒品贸易总额超过 6000 亿美元，而淘宝去年的交易量也才刚刚超过 5000 亿美元。像淘宝等电商平台带动了物流和在线广告等相关产业一样，毒品交易背后的巨额利益，也影响了周边非法军火交易、洗钱、雇佣兵和人口买卖等黑色产业链，毒品犯罪已经远非简单的刑事犯罪，而是一个商业闭环。除了毒贩和制毒者之外，包庇毒品的腐败政府和军队同样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一环。由于诸多恐怖组织和反政府武装涉及毒品交易，因此背后还有地缘政治问题羁绊。

纪录片《毒品的生意》硬核之处在于，能够将毒品交易的整条产业链讲述清楚，在揭露现状和问题的时候，还具有不错的故事性，尤其是影片中女记者以实地采访的方式接触和采访毒贩、非法武装人员的镜头，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能够制作如此精良且真实的纪录片，背后的主创团队当然绝非一般人，今天就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部纪录片制作团队中的两位传

奇人物。

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凯·拉尔森（Kaj Larsen）曾经是一名纪实报道记者，报道过包括埃博拉病毒、索马里海盗、金新月毒品交易等重大国际安全题材，并多次获得艾美奖，入行不久就成了美国新闻界的一颗新星。

对于拉尔森而言，在危险地区采访和报道并不是他人生中最危险的工作。做记者之前，他受训于美国海军军校，服役后通过了地狱式的选拔和训练而进入海豹突击队，成为一名特种作战军官。

他曾经在阿富汗与基地组织、塔利班作战，还曾担任特遣队队长参加了非洲之角的反恐行动，在非洲地区追杀恐怖分子。退役之后，拉尔森依旧是个出色的蛙人战士，曾拜师学习泰拳、巴西柔术，并参加 MMA 比赛且获得名次。他还获得了两次冲浪和游泳项目的冠军。

由于长期在中东和非洲行动，拉尔森对当地文化和安全禁忌了如指掌。他在硕士毕业后创立了先锋传媒，在海地、也门、索马里、柬埔寨、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和巴基斯坦拍摄了多部纪录片，涵盖毒品战争、人口贩运、监狱生活和海盗等诸多题材。他被一些人称为“最疯狂的记者”，任何美国新闻记者不敢涉足的危险地方他都敢去，每次都能在当地从容地拍摄到极具新闻价值和故事性的影片。由于片子拍得好，拉尔森的先锋传媒一炮而红，他其后还获邀加盟知名新媒体公司 VICE，成为主编。VICE 是西方千禧一代年轻人最喜爱的新媒体频道，以制造吸引年轻人眼球的炫酷内容著称，可以说是先锋文化的传媒代表。



拥有一名海豹突击队成员出身的制片人，是《毒品的生意》这部纪录片成功的关键。当然，除了拉尔森这样制作人，这部硬核新闻纪录片的出镜女记者阿玛丽莉斯·福克斯（Amaryllis Fox）也经历传奇。

阿玛丽莉斯在进入媒体之前，表面身份是古董和艺术品商人，真实身份却是中情局卧底特工。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开身份的中情局卧底女特工。2019年，她公开出版回忆录《卧底人生：我在中情局的日子》，引起轰动。

阿玛丽莉斯出身名门，生父霍德森·桑伯（Hodson Thorner）是经济学家，在投资银行担任高管，母亲则是英国演员拉格·达梅雷尔（Lalage Damerell）。父母离婚后，阿玛丽莉斯跟随母亲与继父史蒂文·M·拉尔斯（Steven M. Rales）在美国生活，后者是企业家。

由于父母都是名流，阿玛丽莉斯自幼便乘坐私人飞机环球旅行，18岁时以兼职记者身份采访昂山素季。她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国际法，期间，她的一位老师在中东做研究时被恐怖分子杀害，她发誓要报仇。22岁完成硕士学

#### 《毒品的生意》剧照

位的同时，她进入中情局秘密训练基地，接受行动特工培训。

阿玛丽莉斯完成了各种严苛的训练，学会如何使用武器杀人和秘密与外国线人接头。毕业后，她以艺术品商人身份为掩护，在中东和中亚地区活动，接触和渗透恐怖组织，获取情报。

从中情局退役之后，阿玛丽莉斯成为演员、媒体人和社会活动家。第二任丈夫罗伯特·肯尼迪三世小她3岁，来自美国政治豪门肯尼迪家族。阿玛丽莉斯和肯尼迪举行了一场皇家级别的海上婚礼后，并未按照传统冠上夫家肯尼迪姓，而是保留了前夫福克斯的夫姓。

阿玛丽莉斯就像自幼“开挂”。拍摄《毒品的生意》时，她穿着防弹衣，戴上头盔深入毒贩活动的南美洲丛林采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这是部值得一看的片子，而影片主创人员的人生，更是充满了传奇和戏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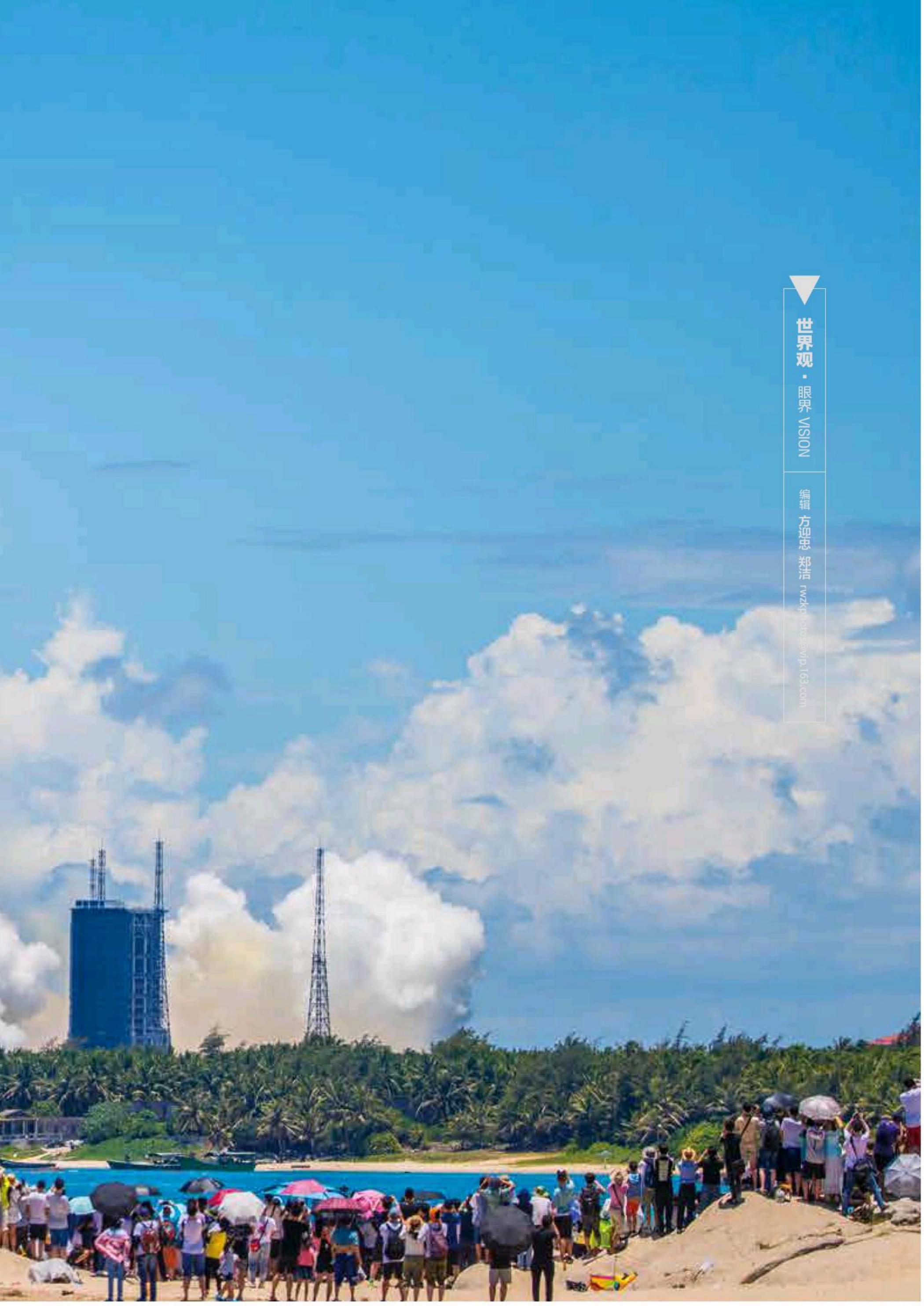


# 海南

7月23日,海南文昌,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了中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图/人民视觉





世界观 · 眼界 VISION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photo@vip.163.com

▼  
世界观 · 眼界  
VISION

编辑 方强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 香港

7月27日，一名女子戴着口罩乘坐天星小轮。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当天下午介绍，截至27日零时，香港新增14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高。  
图/人民视觉



周璇肖像(摄于1940年)

## 百年光影中的 “金嗓子”

——周璇诞辰 100 周年

周璇短暂的一生，拍摄了四十余部影片，演唱了两百余首歌曲。她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最耀眼的明星，她的电影和歌声曾给“孤岛”时期的人民带来安慰和愉悦，描摹出或迷惘或享乐的旖旎浓郁的海派风情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光阴荏苒，四季轮转，“金嗓子”周璇今日如若健在，该满 100 岁了。

上世纪 30 年代，大银幕上那个明丽纯真的“小红”，噘嘴摩娑着两条麻花辫，一曲《四季歌》，从春数到冬，唱的都是好景致；令人唏嘘的是，歌声背后的一代巨星周璇，经不住这人世的大暑大寒，只活了短短 37 个春秋……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水银灯下“马路天使”，留声机畔“天涯歌女”，十里洋场，流光溢彩，天上人间，转瞬即逝。多

少年过去了，周璇的歌声，仿若一颗时空胶囊，总能开启人们对老上海的纷繁回忆与想象。

白先勇在《上海童年》中记叙：“那时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于飞’。”

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灵感来自于周璇主演的《长相思》里面的主题曲《花样的年华》。”

周璇短暂的一生，拍摄了四十余部影片，演唱了两百余首歌曲。她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

代上海最耀眼的明星，她的电影和歌声曾给“孤岛”时期的人民带来安慰和愉悦，描摹出或迷惘或享乐的风流浓郁的海派风情。

当时，有华人生活的地方就有周璇的歌声，她的影响远远超越上海，甚至超越了时空限制。有人说，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国语老歌是七八十年代以至整个华语流行乐坛取之不尽的宝库，周璇的歌声也给台湾的邓丽君、香港的梅艳芳等后辈艺人以营养滋润，不少港台歌手都是从翻唱这些老歌出道的。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主流刊物曾赞周璇是“后无来者的一代歌后”。

“提到她的歌唱，可称是现代利用话筒唱歌的鼻祖。从前唱歌都是拉开嗓子大声唱，她却巧妙地利用了话筒轻轻地唱，讲究字正腔圆、柔和缠绵和娓娓动听。”据曾经多次与周璇搭档拍戏的演员舒适回忆，“有一次在百代公司听她灌唱片，她站在话筒前凑近话筒在唱，我们在旁边，只听见伴奏的音乐，一点也听不到她的歌声。到了录音室通过放样片，才听到与音乐很和谐的歌声。”

周璇扬名上海滩始于14岁，当时电台称赞她的嗓音“如金笛鸣，沁入人心”，从此她便被冠以“金嗓子”的美誉。作为中国最早的歌影双栖明星，周璇的“轻吟浅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签，这种曲风也借着她的歌声不断被继承发扬；她又以歌手身份涉足影坛，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带来了大量新式“歌舞片”。

“我小时候最早听到妈妈的歌也是《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因为《马路天使》这个电影重复在放。80年代我调到电影资料馆工作，有机会看到不少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其中有些刚收回来的，例如1949年拍的《彩虹曲》，据说中国首部彩色电影。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到了她跳的舞蹈，而且是各种风格的，例如后来流行的迪斯科，这片子里都有，挺好玩的！”

远在加拿大的周璇次子周伟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谈及他对母亲艺术成就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还有一部电影《夜深沉》，我惊喜地看到她唱的京剧，唱腔非常地道，眼

神也很到位。她的京戏没白学，唱念做打，声情并茂。我妈妈在声乐学习上很刻苦，当时她已是明星，还和白虹一起到美籍歌唱家家里学习西洋美声唱法。现在一说周璇就模仿她奶声奶气用小嗓唱《天涯歌女》那些小曲，但这只是她的30%，她还有很多艺术歌曲，比如《彩虹曲》中，她展示了花腔女高音，我去定过音，结尾唱过了High C。”

1942年6月12日，周璇曾在上海《大众影讯》刊载了一篇题为《我爱歌唱》的随笔，文字直白，情真意切。

冗长的岁月，仿佛在我头顶上掠过。每当早晨，我面对着这架“披爱农”（piano，钢琴译音）试练我的歌喉……出神了，我有时候不自觉地把手放下，似有一美丽的鸚鵡跳跃着，嘹亮地一声，鼓动我歌唱的心弦。

我爱歌唱，比爱自己的生命更甚。每天无论在家里、在摄影场上，甚至化妆完毕之后站在“开麦拉”（Camera，摄像机译音）前面，我也情不自禁地哼着、唱着。

十余年的熏陶，我没有一天离开歌唱，放弃过我的歌唱生活。我曾经向我妈说：“我的一生是为唱歌而活的。”妈不大了解我这句话，时常责我怪脾气……歌唱一半是天赋，另一半是需要磨练。贺绿汀先生说我的嗓音近乎B调，所以让我唱抒情的歌曲。许多歌所以受广大听众欢迎，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歌唱是我的灵魂，我把整个生命献给它。”这是我的誓言，我牢牢地实践着，永远地、永远地……

## 马路天使，“这个小丫头神啦！”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17岁的周璇倚着窗台，甜美娇嗔，一边喂食笼中鸟儿，一边低吟浅唱《天涯歌女》。

《马路天使》中这个明媚的镜头，在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电影版图上散发着独特光芒，且永远定格于世界影史。

那时的周璇，年方二八，还不见日后的绝代风华，但她只用了三个演唱段落，就塑造了



初涉影坛的周璇(摄于1935年)

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歌女形象。

据演员赵丹回忆，导演袁牧之将周璇刚领进剧组时，她“穿一件淡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平底搭鞋黑皮鞋，剪得短短的头发，无半点矫饰，也没有当时那种电影演员的风度和气质，更像一个女学生”。导演向大家介绍周璇时，她羞涩慌乱的神态和动作，还带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气，令在场剧组人员忍俊不禁。

《马路天使》以活泼的喜剧格调传达了深沉的悲剧内容，再现上世纪30年代都市底层人民平凡而卑微的生存图景。导演给大家讲戏时，周璇两手托腮，眨巴着大眼睛，就像孩童贪婪地听着大人讲故事，她好奇而专注，时而忍不住笑出声来，时而被吓得缩起了脖子，时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尽管没有接受过系统表演训练，周璇的感受锐敏，情到形到，她站在水银灯下唱起《四季歌》时，身世凄凉、活泼纯真的卖唱姑娘“小红”立刻就出现在大家眼前……仅仅这一个画面就把当时摄影机旁看她表演的人都给怔住了。“呵，这个小丫头神啦，竟然是导演要她有什么她就

有什么！”赵丹禁不住跟边上的资深演员魏鹤龄称赞道。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几日前，别人排演时，周璇还像个孩子似的跟个12岁小演员一起趴在地上打玻璃弹子呢！

导演袁牧之最早是在参演《风云儿女》时认识的周璇，虽然她当时不是主角，只扮演了一个舞女甲，但首次上银幕时自然淳朴的表演给袁牧之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袁牧之又从周璇养父的次子、电影演员周履安那里得知周璇身世，遂下了决心起用她来饰演《马路天使》中的小红。

周璇在《马路天使》中的表演可谓本色、自然，更多依靠感觉和自身生活经验，因为她有着和“小红”一样的迷苦身世，正如成名后她在自述中所言：“我是一个凄零的女子。我不知道我的诞生之地（只知道是常熟，不知道哪一个村落），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当我六岁的时候，我开始为周姓的一个妇人所收养，她就是我的养母。六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

周璇大半生都在寻找亲生父母，可直到去世也没有找到。关于她的身世之谜，曾有种种传言，甚至说她是庵里抱来的尼姑的私生女。成年后的周璇曾四处探访，认为自己找到了母亲的原生家庭：周璇原名苏璞，1920年生于常州，父亲苏调夫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在嘉兴教堂当牧师；母亲顾美珍曾在常州市武进医院的护士班进修，后任护士长。苏璞还是婴孩时，母亲把她留在常州外婆家，4岁左右却被不务正业的舅舅拐卖至金坛县，两年后又辗转送到了上海周家，养父周文鼎、养母叶凤妹，她被取名为周小红。

在周璇的表述中，童年记忆自是悲苦。“养父家里另有大妇”，她与作为二太太的养母的生活“困苦颠连”、“断绝供给”，养父“吃喝嫖赌”、“吸毒成瘾”、“积蓄败个精光”，“后来，我们家



1930年代,周璇(左三)与明月歌舞团的同伴在演出时合影

境越来越穷困，养母被迫去帮佣度日，那个被鸦片熏黑了肚肠的养父竟丧心病狂要把我卖去妓院当妓女，幸亏养母及时搭救，才免去我一场更大的灾难……那时只知道日子越来越苦，往往饿着肚子呆呆地坐着，口水直往肚里咽，不敢说也不敢哭，否则养父会穷凶恶极地打我，用缺德的方法折磨我，捉弄我。”

周璇对自己的不明身世毫不避讳，令人慨叹的是，即便日后大红大紫，孤苦凄楚的色调仍贯穿了她的一生。周伟受访时表示，“母亲的悲剧和她从小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她的个人情感比较单薄，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又很难做出对自己比较有利的选择。”

### 明月社的新星，“周璇”于沙场之上

1931年6月，骄阳似火，暑气逼人，十来岁的“周小红”在弄堂里边搓衣边哼唱，清脆甜润的嗓音吸引了恰巧路过的“明月歌舞团”琴师章锦文。

“小妹妹，你唱得很好！”章锦文上前拉住满手肥皂泡的小周璇，发出邀请，“来参加我们的明月社吧！”小周璇迎来了改变她一生的转折。

明月社坐落于常德路一栋三层小楼里，这个由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创建的歌舞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颇为活跃。周璇进入明月社之时，里头多位团员已在业界小有成就，黎莉莉、王人美、薛玲仙、胡笳等人已是歌舞表演明星。和她差不多同年进入明月社的，还有一位名叫聂耳的小伙子。

经章锦文引荐，周璇“面试”时唱了一首江南民歌中的抒情小调：“我有一段情呀，唱巴啦诸公听，诸公各位静呀静静心呀，让我来唱一支江南景呀……”当唱完一个应该拖长的音符时，歌声戛然而止，她羞涩又紧张地看了看在场每个人。尽管唱得拘谨，但她甜润的嗓音有种独特韵味，黎锦晖操着带有湖南口音的国语鼓励道，“小妹妹，你的嗓音很有前途，但还需刻苦练习，你能吃苦吗？”周璇的脸涨得通红，连连点头，“我不怕苦。”

明月社的训练综合了歌唱与舞蹈表演，社员们的学习包括音乐理论、歌唱发声、乐器弹奏、

舞蹈动作等等。年纪轻轻的周璇虽然没什么基础，但她虚心好学、勤奋刻苦，早晨练声乐、中午弹钢琴、深夜背台词……加之天资聪颖，进步极快。周伟向本刊记者介绍，“上海的小洋房都是水泥和木质结构的混合体，后面背阳房间都是水泥地，我跟几位明月社成员聊天，他们都记得，当时虽有练功房，但我母亲非常刻苦，为了给自己加餐，别人还没起床时，她大清早起来就在水泥地上练功、劈叉，大冬天水泥地冰冷冰冷的，她也从不怕苦不怕冷，即使寒九天也照练不误，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练到出汗。”

周璇初进明月社，一口南方方言，唱歌吐字时，翘舌音与齿音不分，曾经让她十分苦恼，觉着“学国语比唱歌难”。为了学好国语，每逢翘舌音与齿音的字，周璇一天要读个上百遍，就这样苦练，日子久了，成效显著。攻下语言难关，为她后来迈向有声电影时代的银幕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璇的第一任丈夫严华，上世纪30年代颇有名气的作曲家和演员，曾是她在明月社的国语及乐理老师。据严华晚年在文章中回忆，除了练功、学国语，周璇在钢琴上也下了一番苦功。“她初进明月社哪捞得着她去摸钢琴……先进社的演员上午都要弹钢琴，她只好等人家弹，她在一边看，等到下午一般不排练，或者别人不弹，她才能去摸一摸。她恳求号称胖姐姐的章锦文教她弹，五线谱不识，也请胖姐姐教，就在这‘明学偷弹’的情况下，两年不到已经弹完‘拜伊尔’全部基本练习曲。她在艺华公司拍《三星伴月》电影时，方沛霖导演看到她看着五线谱，弹着钢琴，还能自弹自唱，赞不绝口，引以为奇。”

也是因着练琴之事，让周璇对这位教她国语的“严先生”暗生情愫。有天早晨，一个提琴师正靠在钢琴盖边上拉小提琴，周璇见钢琴闲着，跃跃欲试地走过去把琴盖掀起，哪料到这位提琴师一声吼叫，竟粗暴地一脚把她踹在了地上。周璇顿时被吓哭了，恰巧被闻声赶来的严华撞见……严华平日里性格温和，肯吃亏，能忍让，社里同仁亲切地叫他“傻瓜”，但这次他却不依不饶，不仅当天安慰了哭泣的周璇，次日出于义愤，他还在社委会会议上公开批评了那位提琴师，

让对方向周璇赔礼道歉。此事让周璇心生感激，她对严华的“师生情谊”发生微妙转变，也铺垫了两人日后的“璇华之恋”。

1932年新年前的一场演出，歌舞剧《特别快车》即将开演，明月社的台柱王人美还没到场，救场如救火，12岁的周璇临时被安排上场成为主演。出人意料又在预想之中，她的优美舞姿和甜润歌声，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很快，周璇演唱的《特别快车》被灌制成唱片，广为流传，媒体惊呼：“明月歌舞社里又升起了一颗新星！”这是周璇演艺生涯的关键起步。

同年，“一·二八”事变后，周璇参演了明月社的救国剧目，终场她领唱了主题曲《民族之光》，唱到“往前进，周旋于沙场之上”时，她激昂慷慨的歌声点燃了底下观众的抗日斗志，群情沸腾，掌声雷动。

演出结束，社长黎锦晖（《民族之光》的词作者）和作曲家聂耳高兴地上前向她道贺。为了纪念这首歌曲的成功，黎锦晖建议将周小红的名字改作歌词中的“周旋”，自此，明月社同仁都开始亲切地称呼她“小旋子”。不久之后，有人建议取“美玉”之意换作“璇”字。于是，“周小红”的名字悄然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未来震撼歌榭影坛的——“周璇”。

## “五月的风”吹遍上海

“五月的风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假如呀花儿确有知，懂得人海的沧桑，它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五月的风吹在树上，枝头的鸟儿发出歌唱，假如呀鸟儿是有知，懂得日月的消长，它该歇下歌喉羞惭地躲藏。五月的风吹在天上，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假如呀云儿是有知，懂得人间的兴亡，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假若有一种所谓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情调，那便是从周璇这首名曲《五月的风》吹起并荡漾开的。她的演唱低回婉转，不疾不徐，将歌中的乐景悲情、人海沧桑娓娓道来，这柔美的岁月留声总能触到人们内心最脆弱敏感的神经。

明月社的歌舞生涯，是周璇一生中阳光灿

烂的日子，正如她后来在回忆文字中记述：“我开始以歌唱为职业，并认识了严华。在当时我把它称作生活的起点……我每天陶醉在音符飘浮之中，过着嘻嘻哈哈的自由生活。”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周璇在歌坛上起步的时代，恰逢中国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全面发展，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开始掀起一阵“声片热”，同一时期，流行歌曲开始与电影结合，并借助电影迅速在民间传播。

1932年，天一影片公司首开先例，招揽了明月社四大台柱王人美、黎莉莉、严华、谭光友，拍摄了首部有声歌舞片《芭蕉叶上诗》。接着，联华影业又将王人美拉去拍摄《野玫瑰》。由于电影业的冲击，明月社的经济收入难以维持，1933年春末被迫解散，这对艺术上刚起步的周璇而言震动极大。得知周璇深陷困境，严华等人想方设法筹建了新月歌剧社，后又力荐她进入新华歌剧社。新华歌剧社组织了多场演出，周璇又开始受到关注，上海多家电台经常邀请她去播唱，百代唱片公司还把她演唱的《五月的风》等歌曲灌制成了专辑。周璇的多首歌曲通过电台和唱片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为流行一时的名曲。

上海是盛行着爵士音乐的歌唱，爱好歌唱的人们都起来组织歌唱团，有的以业余态度演出，也有的是靠广告的职业歌唱团，上电台去播音，或者是到唱片公司里去灌音，就这样轰动了一时。

我就在这当儿加入了歌唱团，到处献唱，为了自己的兴趣，却也没有感觉到疲倦。相反的，连空闲的时间都花费在训练歌喉中，这样的情形，妈妈是很不满意的，她老人家怕累害了我的身子，常常劝我放弃这种生涯。然而我没有照她的话做，仍旧暗暗地在外面活跃！

((《我的从影史》，周璇，原载于《华影周报》49-52期))

1934年，《大晚报》主持了一次播音歌星的评选活动，周璇以高票当选为三大歌星，仅次于当时的老牌歌星白虹。有媒体评论周璇，“小小歌星，前程似锦，前途无量”，电台赞美她的嗓音“如金笛鸣，沁入人心”，自此，“金嗓子”

的冠名不胫而走。

为了提升自己在歌唱事业上的知名度，周璇也主动宣传自己、以各种方式经营事业，仿照好莱坞每年向影迷提供一百万张影星照的作法，“周璇……这几天……在沪江照相馆，印了两百张的照，听说预备新年送给爱护她……的先生小姐们。”（1936年元旦《申报》消息）声名鹊起的周璇，以照片与歌迷建立联系：不只耳听歌曲，手中还握有最摩登的歌星独照可供观赏。

周璇的歌声和演艺才能也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1935年，新华歌剧社解散，经人介绍，周璇成了艺华影业公司的基本演员，开始了她的银幕生涯。在王人美牵线下，周璇得以在电通公司出品的《风云儿女》中客串了一个角色，她“一学就会”的本领引起业内人士的注意。通过这部电影，周璇从袁牧之、夏衍、田汉、贺绿汀、王人美等电影工作者身上学到不少知识和技能。据当时一篇“电通”访问记所写，“那儿充满着‘青春泼辣的精神’，充满着‘热’，也充满着‘力’。水银灯下的空气，是十分欢乐和愉快的。”周璇自己也说，从此“开始了电影演员的生活，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如今总算实现了，当时心里多么高兴啊！”

## “璇华之恋”，何日君再来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软风儿向着好花吹，柔情蜜意满人间。”周璇演唱的代表作《月圆花好》，曲作者正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严华。

周璇进入艺华拍摄电影时，严华在民营电台靠播唱维生。在周璇演艺生涯起步期，长她8岁的严华亦师亦兄，不但教她国语，还介绍她到电台唱歌，把她推荐给唱片公司。从小缺乏关爱的周璇，对这位讲义气重情义的兄长产生了淡淡的爱意。“几年来枯燥乏味的日子渐渐在我眼前泯灭，感到心灵上有了点滋润，生活上有了着落，也因为这层关系，我对严华的好感逐渐增加起来。”

1936年初，严华将到南洋进行巡演，临行前，



周璇特意邀请他来家中吃饭，还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了他。登上轮船，严华翻开了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记本，里头记录了周璇进入明月社以来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变化，也承载着少女情窦初开的心迹。据严华《难以淡忘的回忆》记录，“从我为她打抱不平，他就爱上了我，我心里十分激动，我连忙写信给她，发去了爱的回音。”

初恋时的离别与爱意，化入了周璇与严华的对唱歌曲《叮咛》。“我的年轻郎，离家去南洋，我们俩离别，顶多不过二春光，望郎莫悲惶，不必太心伤，沿途多保重……我的年轻妹，娇柔又美慧，我们俩离别，两春不到就可再会，望妹莫牵挂，细心来理家，凡事要谨慎。”这首歌后来也成了周璇的代表曲目。

严华在南洋巡演时，纷飞的信件漂洋过海，传递着这对恋人焦灼难耐的相思。1936年秋，严华归国，与周璇订婚。两年后，他们在北平春园饭店举行了婚礼，婚后那段浪漫甜蜜的日子，也是周璇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

初进艺华公司，周璇月薪40元，每年都有所增加，属于中等收入。刚开始，她还只是个配

#### 《马路天使》(1937)

角。1936年参演影片《花烛之夜》，周璇担任了第二女主角。据她自己回忆，初入影坛，那次拍摄她非常紧张。“这戏正好是我电影生命的开始，虽然不是我主演，可是我很担忧……我害怕到极点了，我的心跳得厉害。有一次布景已经搭好了，许多同事等候我上场，我眼看着这严肃的空气，使我更加不安起来……结果终于拿了剧本躲在布景背后呜咽起来。”

在片场几位前辈的鼓励下，天资聪颖的周璇很快适应了水银灯下的生活。“日积月累地倒也熟练了，结果非但不觉得害怕，反觉感到不够，并且常常想深追穷追地精益求精，由害怕电影又变成爱好电影。”接着周璇又参演了艺华拍摄的《化身姑娘》、新华邀演的《狂欢之夜》等。1936年10月，在艺华摄制的黑白喜剧故事片《喜临门》中，周璇已擢升为女主角。“《喜临门》演完之后，我渐渐得到一个结论：勇气能克服一切……正像学唱歌一样，想唱得更好



1939年,中国十大女影星合影。从左至右:龚秋霞、罗兰、孙景路、陈娟娟、陈云裳、胡蝶、周璇、李丽华、白光、王丹凤

一些,一定要鼓起勇气来磨练;要使演技动人,一定要鼓起勇气来效仿。”

《喜临门》之后,1936年冬至1937年春,周璇又相继主演了艺华影业出品的《百宝图》和《满园春色》等影片。对于周璇的表演天赋,艺华公司非常重视,预备把她捧成红星,但当时的她正沉醉在爱情中,拍摄《三星伴月》期间,为了跟随严华去杭州演出,她向公司请假,未得允许,但她不管不顾,坚决去了杭州,结果《三星伴月》拍完后,她与艺华公司的宾主关系破裂。

《三星伴月》是周璇与艺华公司合作的最后一部影片,这本是普普通通的一部广告歌舞片,因获三星牙膏中国化学工业社资助而得名,但片中插曲《何日君再来》经影片放映和灌制唱片,立即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一度成为舞厅里热门的伴舞音乐,传遍了上海滩。此曲曾经李香兰翻唱并传至日本,周璇去世多年后,邓丽君的翻唱又再次掀起这首经典名曲的传播。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方全部沦陷,数百万人在日寇的铁蹄下开始了苦难生活。有人说,上海沦陷前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沦陷后流行的歌曲是《何日君再来》。1941年,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中描写舞场情节时以此为背景歌曲,于是有人就认定此曲乃渲染十里洋场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靡靡之音。同一年,在中国成名的日本影星李香兰(山口淑子)在其主演的影片《白兰之歌》和《患难交响曲》中也演唱了这首歌曲,《何日君再来》的定性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我是个周璇迷,非常喜欢她的歌。”出道稍晚的李香兰是周璇歌迷,据其回忆,“灌制《夜来香》唱片那天,当乐队随着黎锦光先生的指挥棒响起那轻快的前奏时,我透过录音室的玻璃窗,突然发现一位楚楚可怜的女士,站在监听室那里目不转睛地朝这边望着,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女明星周璇。前奏完毕后刚要开始唱时,我因为见到偶像过于激动兴奋,情不自禁喊出了一声‘哎呀,周璇!’结果由于这意外的插白,使得录音成为NG(作废)。”

这次以后,李香兰和周璇成了好朋友。在她眼中,周璇“温柔娴雅,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她们经常一起喝茶、吃饭,“彼此交换一些各自的拿手歌,或到她家的钢琴前干脆待上几个钟点,因为她要学习乐章结尾时的婉转唱法,我们曾在一起进行过热心研究。”

《何日君再来》后来又被引入日本,渡边浜

子灌制了该曲的日文唱片。李香兰评价说,“《何日君再来》是中国歌曲在日本流行的开端。”这首歌在日本也经历过风靡和遭禁的波折。历史的原因成就了这首歌,政治的标签却使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歌唱者遭受了太多磨难。作为原唱的周璇,成名后的情路愈发坎坷,也确乎印证了歌词中所写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 孤岛求生,婉辞“影后”桂冠

1938年,新婚燕尔的周璇和严华回到上海,他们并肩走在南京路上,这条以繁华著称的街道眼前却显得异常冷清,一切都被战争的硝烟吞没了。从黄浦江上吹来的微风,仿佛也掺和着呛人的苦涩味……

“找到工作了吗?”周璇轻声问道。

“没有,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严华瓮声瓮气地答道。

“唉——对了,那位柳老板来找我,听说他们兄弟俩正在筹划开设国华影业公司,亲自坐车到家来请我去当他们的台柱。”

“是金城大戏院那个柳老板吧!”

“是呀。”

严华不作声了。他想起4年前那个春天,新华歌剧社首次在金城大戏院演出:周璇的歌唱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演出结束,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来到后台。“小小年纪唱得不错嘛,”这人进屋后边走边说,引起在场人们的注

意。他径直走到周璇身旁,旁人引荐:他就是这个大戏院的柳老板。“哦,柳老板,您好!”周璇正在下妆,她从镜子里看到了柳老板那张长长的白皙的脸。“哈!嘴好乖噢,干脆你给我做干女儿吧!”旁人起哄:“那小璇子就应该叫柳老板干爹啰!”这位青年老板将比自己只小8岁的周璇认作干女儿之事很快传了出去,以后就成了事实。当时严华也在场,见此景象,心生反感……

周璇离开艺华之后,曾一度加入新华公司。1938年8月,柳中浩、柳中亮兄弟投资创办国华影业公司,“干爹”盛情相邀,周璇与国华签订了长期合同,这一纸合同,在她向艺术巅峰攀登的同时,也为她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隐患。

签约国华后,周璇开始了新一轮拍片高峰,同时又要和严华去电台播唱。周璇性情温和讲究“情面”,为了尽量让老板们满意,不得不奔波劳苦。当时她已有身孕,由于过度劳累,一次在电台播唱中当场晕倒,未能保住腹中胎儿。这次流产对周璇是个沉重打击,她卧床不起,精神恍惚。但没等她身体完全康复,柳中浩又登门拜访,“趁着年轻多拍几部片子吧。”尽管严华表示反对,但柳中浩软磨硬泡,成功怂恿周璇立即复出主演了《孟姜女》。

从1938年至1941年,作为国华“台柱”的周璇,主演了《孟姜女》《李三娘》《新地狱》《七重天》《董小宛》《三笑》《孟丽君》《黑天堂》《苏三艳史》《西厢记》《梦断关山》《梅妃》《夜深沉》《解语花》《恼人春色(上、下)》《天涯歌女》等共17部影片,演唱了片中近40首歌曲,这样的成绩在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当年,凡周璇主演的影片,无论古装片还是时装片,每部都引起轰动,深受观众喜爱。她主演的电影拷贝特别抢手,不仅在国内,东南亚一带也抢着来买,有时片子还没拍完,片商就已携着现金来订购了。

国华高度市场化的运作打造了周璇这块“金



周璇与严华的结婚照

字招牌”。然而，大银幕上光彩照人的周璇，平日里因为通宵达旦赶戏，健康每况愈下。她经常头痛、失眠，极度劳累时，甚至要靠打牛肝针来维持体力，很早就埋下了神经衰弱的病根。对此，严华极为不满，国华完全把周璇当成了公司的“摇钱树”。

“但柳中浩说，我把她捧为掌上明珠都来不及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时同行竞争很厉害，一个片子两三家公司同时拍，拍完谁先上就谁挣钱，你要赶工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周伟后来拜访了母亲的这位“干爹”，“柳中浩说她聪明、悟性高、学东西快，而且拍电影不浪费胶卷，那时进口胶卷多贵！周璇每部片子他都喜欢，柳中浩对她的表扬就是‘一遍过’，上镜前，她一定找个地方安静下来，让自己跟角色融为一体，台词脱口而出，在台上跟对手演戏，唰唰唰一遍过，导演都非常满意。还有她从不耍大牌，总是提前几分钟到片场，到得早，如果清洁工还没来，她甚至会拿扫帚把场子打扫干净，等大家来时马上就可以开始，很认真。”

自《李三娘》起，演员舒适和周璇搭档了多部影片，在他记忆中，“周璇没有亭亭玉立的身材，也没有国色天香的容貌：茶褐的容颜，配上一双单眼皮。好在她五官端正，轮廓好，行话说：‘上镜头’，经化妆师略施粉黛，拍起镜头来就楚楚动人。她对演戏是严格认真的。记得有一次和她拍戏时，试了几遍戏，她似乎也没有什么激情，到了正式开拍时，她竟热泪夺眶而出，霎时间使我感到极为意外。再加上她那委婉动听的歌声，无怪乎她受到广大观众的爱戴，这说明周璇不是靠姿色而是靠艺术制胜获得成功的。”

在当年的女明星中，周璇是一位好静的红星，交际场中鲜少看到她的踪迹。据曾和周璇在《孟姜女》等多部电影中演对手戏的徐风回忆：“周璇给我的印象是性情温和、性格内向、行动举止和待人接物都比较稳重的人。”

1941年，《上海日报》发起“电影皇后”选举，周璇高票当选，但结果公布后，她随即发表启事，婉辞“影后”桂冠。“顾璇性情淡泊，不尚荣利，

平日除为公司摄片外，业余惟以读书消遣，对外界情形，极少接触，自问学识技能，均极有限，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则不胜感荷，敬希亮鉴，此启。”

## “娜拉”出走，“疯狂世界”

在周璇事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她与严华的婚姻却日渐出现危机。

1941年，国华拍摄由张恨水小说改编的黑白故事片《夜深沉》，柳中浩为了宣传，以公司名义发声明称：新片由周璇自挑男主角做搭档，立刻引来外界关注。周璇为了提携新秀韩非，将这位年轻男演员选作主角，不想却招致各种流言，绯闻传到严华耳中，自然心里翻腾得厉害。

影片开拍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得严华与周璇之间的误会更深了。据严华的妹妹严斐回忆：“有天夜里拍戏拍得很晚了，哥哥在二层阳台看着，韩非送回来，半夜里头有说有笑的。哥哥她不回来他不睡觉的，那时候刚结婚有感情，有点嫉妒，就跟小璇子吵。”

这次争吵之后，为了甩掉烦恼，周璇拍戏之余常住在柳家，据说还有小报传出周璇与柳家父子的绯闻。面对各种飞短流长，严华有几次在盛怒之下失手打了周璇，导致周璇离家出走，找不到妻子的严华又登报指责“周璇携款卷逃”，两人的矛盾不断被渲染、歪曲、扩大……人言可畏，周璇濒临崩溃，甚至要服毒自杀，还好被人及时发现，抢救了过来。

“罗素说：‘宁愿战斗以死，不愿忍痛以生！’我需要战斗，这就是我离家出走的唯一理由。”周璇后来在《我的所以出走》中写道：“在我的想象中，以为前途注定了光明和幸福，生活会永远美好……谁知一切并非我预料的那样，渐渐地，猜疑、诬蔑、诽谤，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我是人，我有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经过思索，我终于选择了‘娜拉’的道路，噙着泪水离开了家，离开了相处九年的丈夫。”

周璇与严华的婚变一时成为“孤岛”上海的特大新闻。经过一个多月的调解，他们双方都曾想过破镜重圆，但由于好事者的挑拨，居



《渔家女》(1943)

心叵测者的干预，这对“佳偶”的婚姻还是在满城风雨中走到了尽头。

1941年7月23日，严华在浦东大厦的写字间里签署离婚协议，周璇是在寓所签的名，两人最终未能晤面。周璇向律师表示，自己除储蓄和衣物，其他皆由严华领受。严华也提出以钢琴和灰鼠皮大衣相赠，作为纪念。

周璇去世三十多年后，周伟拜访了严华，“老人家说，找到我，就像地下党找到了党组织！可以想象这种迫切，我们的重逢给他带来希望和满足，有种情感上的弥补。严华就是大男子主义，他当时的心理，换位思考下也能理解。”

严华晚年曾不无慨叹道：“我是爱周璇的。我考虑过重归于好，相信她也有同样考虑。但一想到她的演艺生涯，要不断同其他男演员合作，还有那么多应酬——这是我难以接受的。”

据作曲家贺绿汀回忆，周璇“出走”期间曾来找过他，“她一见面就说：‘这个短命（沪语：没劲，没意思）电影我不拍了！跟你走，找新四军去！’周璇说得很恳切，也很坚决。听得出来她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所处环境并不满意，向往新的生活和要求进步的心情是急迫的。这

一切使我很感动。但考虑到她当时的名气已经很大……带她一起去找新四军，过于招风，风险太大。”

那次，贺绿汀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星期就走了，临走前托人给周璇留了个口信，建议她要走就先去香港，那里蔡楚生等电影界前辈会帮她。“周璇后来果真去了香港，还拍过包括20世纪50年代受到批判的《清宫秘史》在内的一些电影。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部片子，恐怕也不见得一定是坏戏。”

与严华离婚后，周璇在柳家暂住了一段日子。1943年初夏，“歌影”大半年的周璇，在张善琨的游说下，决定参加由其掌管的“华影”，出演了由卜万仓执导的《渔家女》，这部戏的底本是卜万仓20年代拍的默片《玉洁冰清》。

首次合作，卜万仓对周璇的为人和表演评价极高：“她不但聪明、努力，对于演戏非常用心，而且一切演员的服务道德，她都能严守。拍戏时她从未迟到或缺席，对于导演的话非常听从，而且虚心向人求教，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在周璇的演艺生涯中，《渔家女》可与《马路天使》相媲美。23岁的周璇在片中成功塑造了渔家女翁琼珠美好善良、智慧勇敢的形象，其中，琼珠因爱情受挫而发疯时唱出的那首《疯狂世界》，清晰勾勒出一个浮生若梦、黑白颠倒的时代，被“孤岛”男女寄托了无穷哀愁。此歌一经问世，即风靡上海滩。

“他们来帮我们的忙？他们把我们的家抢了去了！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抢了去了！现在拿钱来买我们的心。”“你们拿钱来收买我们。”“我们穷人就是不稀罕这个钱！”剧尾高潮，周璇横眉立眼，一指千钧，发出呐喊，她扮演的琼珠，看似开骂情敌，却传递出对当时日本侵略军的悲愤控诉。导演卜万苍解释那《疯狂世界》，“实际上是对沦陷区的现实世界的否定和诅咒”。周璇全身心投入的“疯癫”表演，直指中国人民遭受日本蹂躏后负辱尤深的切身之痛。《渔家女》

在上海公映后，造成了万人空巷的观影盛况。

“鸟儿为什么唱，花儿为什么开，你们太奇怪，太奇怪。什么叫情，什么叫爱，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开，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如今回首，周璇当年发自灵魂呐喊的一曲《疯狂世界》犹如谶语，将她自己的人生也推向了后来失控的悲剧。

## 凤凰于飞在云霄

记者：“听说你平日除了拍戏极少外出，每日在家看书，弹琴练唱，这真是难得。像你这样的大明星，手头富裕，怎么不及时享享福？还学什么呀？”

周璇：“一个女子能在社会上谋事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有工作做的人更应当自勉，千万别给人家笑话，给人家轻视，再说学无止境呀！”

（《新影坛》编辑部组织的《渔家女》座谈会上的问答）

1943年至1945年，周璇相继拍摄了《渔家女》、《鸾凤和鸣》、《红楼梦》和《凤凰于飞》共4部影片，每部都创下极高票房收入，百代唱片公司为周璇灌制了全部电影插曲，销量居全国首位。

浏览当时《申报》，舞厅邀请别的歌星“每场献唱《鸾凤和鸣》插曲”，连日伪政府制作的电影《蝴蝶美人》也在“休息时间播送周璇最新流行唱片”。

战争接近尾声之时，周璇的电影与歌曲在上海滩再掀热潮。

1945年3月底，周璇举行了三天六场的“银海三部曲：周璇演唱会”，由上海交响乐队伴奏，黎锦光与陈歌辛担任乐团指挥，独唱会票价高达3000元（旧币），但依然销售一空。台上摆满花篮，最引人注目的是《凤凰于飞》导演方沛霖以鲜花扎成“金嗓子”三个字的大花篮。1945年5月《上海影坛》报道：“据说三天演唱会共售四百余万元，除一切必要开支外，周璇名利双收。”

相比于光芒万丈的演艺事业，周璇的情感

生活扑朔迷离。自从和严华离婚后，她再也没有正式结婚。据说1944年，周璇曾受到来自“76号”（日伪特务机关）的“登门”威胁，她和家中姆妈受到惊吓。当时慕名前来的朱怀德自告奋勇出了点子，这给周璇留下好感。朱怀德是上海一家著名绸布店的老板的儿子，据当时的普遍说法，这个上海男人洋装笔挺、风度翩翩，非常懂得体贴关爱女性，周璇与他马拉松式地淡然相处交往了七八年，但前期一直没有接受他。

“石先生的优缺点，我一时还批评不出，见不到什么特殊的显著之处，不过我觉得他虽不温柔，也不粗暴，给他四个字吧：沉默寡言。”抗战末期一次机缘巧合，周璇与“话剧皇帝”石挥邂逅，此后两人交往密切，圈内同行曾热情撮合过，他们在情感上也互相试探，但周璇因之前婚姻失败，对此极其谨慎。有记者采访提到石挥，周璇只是打太极：“告诉你，我们感情很好，不过到现在还是普通友谊，我们同是电影从业员，他（石挥）看得起我，同我交朋友，我当然乐意接受，是吧？”记者穷追不舍：“你最知己的男朋友是谁？”周璇俏皮答复：“我告诉你，男朋友很多很多。”她哈哈大笑：“像你今天和我谈的话，我不敢要求你不发表，那么就直写我男朋友很多，这不完了！”

在影视、歌曲背后，周璇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从她一次次面对记者时率性、直白、机智的回答中，或可窥探到这位大明星的真性情。

问：对于自己年龄的增长，有什么感想？答：恐慌。

问：人生必有一死，你觉得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最痛快？答：死在上半天，杭州西湖里。

问：每次，当你说谎以后，心里感到痛快，还是痛苦？答：又痛苦又痛快。

问：你的“口头禅”是什么？答：滑稽来。

问：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你最钦佩的是哪一个？答：花木兰。

问：你以为在现时代下，观众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影片？答：教育片。

（辑自1944年《上海影坛》发表的《周璇



《长相思》(1947)

答二十一问》)

问：人生观？答：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好好做人，像一个人。

问：喜欢和哪个男明星合作？答：演员以服从为天职，怎容私见呢？

问：你的影坛生活有没有受到意外刺激？答：背一句古语作为答覆吧？“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问：你献身影界已经很久了，曾感到一个电影演员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吗？答：请多多指示！我在这里，向你立正敬礼。

问：没拍电影前思想是怎么样的？拍了之后？答：未上影坛之前，我尚在童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思想；献身银幕后，越演越害怕，因为凡事不进则退。

问：你相信命运吗？答：可信而可不信，不可全信，不可不信。

问：一个优秀演员应具备什么基本条件？

答：认真，万事认真！尊意如何？

（辑自1948年12月上海《电影杂志》中的问答）

## 冷宫怨，依今葬花人笑痴

1946年冬，周璇应香港大中华电影公司邀请，离开上海鱼龙混杂的大环境，奔赴香港拍片。她人生中最后11部电影，有9部是在香港拍摄的。据说，周璇在香港拍戏的摄影厂门口，几乎每天都有人等着，想一睹芳容。

《长相思》是周璇在香港拍的首部影片，片中她以歌女形象演唱了后来风靡香岛的《花样的年华》《夜上海》《黄叶舞秋风》等歌曲，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周璇唱片的畅销程度惊人，居所有歌手之冠，加之她从前唱的那些歌，单单版权收入，她一年也有近2000万元。这段时期，周璇在拍电影之外还灌录了大量流行歌曲，包括《永远的微笑》等代表作。

《长相思》之后，周璇主演了《各有千秋》，这是她除《马路天使》之外，自己唯一提过喜欢的电影。和其他电影相比，《各有千秋》没有歌唱情节，也不是她一贯出演的悲剧，它“写物价与环境的关系，写环境与人生的问题”（《申报》广告词），有影评介绍，片子“触及这个动



乱的现实环境，描写人在生活里遭受的种种痛苦”，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影片档案中，记录该片结局：“（女主角）慨叹男女始终无法平等，而女性只是依附男人生存的可怜虫。”或许正是这点，触动了作为“职业女性”的周璇，使她对这部电影情有独钟。

1947年，周璇由香港回到上海拍摄《忆江南》和《夜店》两部影片。在《忆江南》中，她同时扮演采茶女谢黛娥和香港小姐黄玫瑰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她的天赋和演技再次受到观众赞赏。此后，她又赴港拍摄《花外流莺》《莫负青春》《歌女之歌》《清宫秘史》等，其中，口碑最好的要数1948年最后一天上映的《清宫秘史》，周璇演唱的一曲《冷宫怨》，声音色调充满冷冽的绝望，戏剧性地诠释了珍妃复杂的心绪，又仿佛在叙述她自己凄楚的一生。

倔强的个性、时空的距离，加之各种流言，周璇终与石挥错过。周璇往返沪港两地拍片，当她孤身去到香港时，朱怀德特意飞去陪伴，最终以他的殷勤赢得了她的信赖。他们双

#### 《忆江南》(1947)

双在香港同居，朱怀德提出从周璇这里拿些钱，自己先回上海做生意。朱怀德走后不久，周璇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写信告诉他，但他借口生意忙迟迟不来香港。1950年，周璇挺着大肚子回到上海，却得知朱怀德早已与别的女人在一起……她在报上刊登启事：与朱怀德“脱离同居关系”。1951年初，周璇给她在香港的密友、作曲家李厚襄去信：“真如做了一场噩梦，悔也来不及。”

1951年2月12日，周璇又给李厚襄去信诉苦：“近因播音唱了歌，不知道得罪了人，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这几年就是糊里糊涂地过下来，所宝贵的名誉也坏了，下半世等于完了，所安慰的就是一个小孩（周璇长子周民），才能生活下去。”

周璇的生活似乎已经跌到谷底，感情不顺，对新形势不适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她在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4月给李厚襄的信中，周璇提到要拍一部新片。“这次也是给他们逼上梁山，本来谁也拖我不动……对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相比，当然也是帮忙性质。希望的是戏要好，其他的也就不管。”信的最后，周璇又不禁写道，“拍了戏恐怕会很忙！这次我也真不知道怎样来准备它，真是害怕的。”

这部让周璇不愿拍、感到害怕的戏，就是1951年的《和平鸽》，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她扮演一个护士。在拍一场给伤员输血的戏时，不知是台词还是即兴，配戏演员问了句：“你的血干净吗？”这话一下刺破了周璇脆弱的神经。

据周伟评述：“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周璇，

她一下子从角色里回到现实生活中。朱怀德不是也提出过让她验血吗？不是有人怀疑她爱国吗？甚至由于她的富裕，以及过去和朱怀德这样一个负面人物的情爱关系等等，有人还指责她的‘生活态度有问题’，让她作深刻的思想检讨！周璇终于被激怒了，她呐喊道：‘都解放了啊，这样公平吗？’‘我生孩子又碍别人什么事了，再说他是有爸爸的！’‘你们都走开！让我孤独吧！’”

周璇情绪崩溃了，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直到这年9月，她的精神才逐渐恢复正常，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开始写日记。日记的封面上赫然写着：拿人家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和平鸽》(1951)



## 与世周旋了，只能去绝踪

1951年夏，周璇认识了长她3岁的画家唐棣，当时他正在《和平鸽》剧组绘制电影海报。

周璇休养的日子里，唐棣经常去看她，为她绘制肖像，照料她生活。周璇伤痕累累的心慢慢回归平静，她亲切地称呼唐棣“老大哥”，唐棣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1952年，周璇诞下他们的儿子周伟。

得知周璇怀孕后，她身边的人怀疑唐棣的动机，将其告上法庭。1952年5月，唐棣以“诈骗罪和诱奸罪”被捕，判刑三年。这年秋天，周璇再次被送进疗养院，此后整整5年，她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外界也失去了她的消息。

1957年春，周璇病情有所好转，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摄了一段影像《访周璇》，人们听到了“金嗓子”久违的歌声，还有她准备复出的信息：“亲爱的观众：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和关怀。”

令人唏嘘的是，这段影像竟成了周璇生前最后的音画记录，几个月后的9月22日，噩耗传来：周璇突发急性脑炎，不幸去世了……

周璇短短不到四十载的一生，每段都可以打一个结。悲戚童年，坎坷情路，时势逼迫，末世荒凉。一切就如她所唱的那首《心头恨》——“自叹命苦无处诉，世道险恶人情薄。”

据原上海精神病疗养院院长苏复和护士长



汪锦凤回忆，1957年初工作时，他们认出病卡上名为“周玉芳”的周璇，她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床上或蜷缩一隅，不言不语，沉思默念。“她瞳子里流露出历尽人间坎坷、饱经人世创伤的哀诉……又好像在低声哀恳：医生！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快救救我吧！”

周璇入院后，她的两个孩子（长子周民、次子周伟）均由好友赵丹、黄宗英夫妇抚养。对于自己身世成谜的诗人周民而言，他曾坦言：“我是不愿拼命当什么周璇儿子的。并不甘心，但是没办法，一生长下来就是为了叫这个名字。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历史和遗产之间，在信仰和无聊、无稽之间只能沉沉浮浮。我爱护名誉、保护名誉，有时浪漫有时也很屈辱。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周璇；哪里有酒吧，哪里就有周璇。对于她的歌，在理想年代我是这么认为，现在市场主义下我也是这么认识。”

在周民幼时的记忆中，他只见过母亲3次。

“一次她在病后康复期间，到襄阳南路赵丹、黄宗英家里拜访。那天，房间里来了一大帮人，有摄影师、有录音的、有架灯光的，他们在忙忙碌碌。可能是在过道里有人让我叫她妈妈，我怎么搞得清？不肯叫。旁边又有人让我叫了她一声阿姨，大概我这样叫了。后来大人告诉我，那次她不高兴了……”

“第二次是周璇来襄阳路把我接到虹桥疗养院去。当时是电影局派了他们唯一的一辆镶木的小汽车来接的。在疗养院的房间里，她坚持把我拉到身边，一边紧紧攥着我的手，一边和其他人说话。我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她们谈什么，我的手被攥得太紧了，让我觉得别扭、不舒服。终于让我到前面的花园里去了。我用手帕在花圃里捉了蝴蝶和蜜蜂，装进一只纸盒里，等我把这些拿回房间给大人们看时，她好像数落了我几句，意思是只玩这些，又拿过我手里的盒子，走到门口，把小昆虫都放了。接着，让我老老实实坐在她身边，她又紧紧攥住我的

周璇怀抱儿子周民



周伟与生父唐棣(摄于1984年)

手，于是我又别扭、又难过、又不自在……”

“最后一次是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也就是终极之见了。按余光中的诗说：她在里头，我在外头。记得那天，秋雨瑟瑟，家里的阿姨带着我乘三轮车赶去的。追悼仪式上有一个程序是让我走到她身边，她躺在玻璃罩着的铜棺里，头发被理过了，化了妆，穿着黑毛衣，颈脖上挂着项圈。我不懂难过，但有点怕。仪式结束后，阿姨就带我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记得，秋风秋雨一阵紧似一阵。以后在《上影画报》上看到公祭那天的图片。再大一点以后，就记住了黄宗英妈妈那天的悼词：在新社会一定会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好孩子，周璇，安息吧。以后我更大了，到青年，到中年，还有人讲这句话。”

接到本刊记者电话的那个下午，已是古稀之年的周民淡然道：“我们年纪大了，不搞这些了。已经过去的事情，没有兴趣了。普通人，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们正平静地、平凡地、平安地生活着，就这样了，度过余生嘛……”

和周民的低调相比，5岁丧母的周伟似乎心

有千千结，成年后花了大量时间寻访前辈、钩沉往事，对于父亲的入狱，母亲的病情、死亡及巨额财产归向都有所质疑。以笛子演奏出名的周伟，上世纪80年代末，因周璇遗产之事曾将养母黄宗英告上法庭，虽以胜诉收场，但心绪至今都是复杂的……

30年来，移居加拿大的周伟鲜少受访再提往事，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他离周璇似乎已越来越远。3个多小时的采访接近尾声，他突然沉默了，电话那头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重：“周璇不是我个人的，事实上，我现在离母亲越远越好，生活中我想尽量把她忘掉。”

(参考资料：《周璇日记》《周璇自述》《周璇传》《我的妈妈周璇》《周璇画传》《周璇歌曲全集》等。实习记者陈梵、梁文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 深圳楼市 魔幻后刹车

深圳楼市新政出台就像给此前的政策漏洞打上补丁,遏制了投机炒房,但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轨迹

本刊记者 陈洋 实习记者 陈媛媛 包莉婷 卢琳绵  
编辑 黄剑 hj1888@hotmail.com

### 购房资格蒸发

7月15日上午9:33,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份通知,名为《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涉及八项楼市调控措施(下称“7·15新政”),包括调整商品住房限购年限、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措施、发挥税收调控作用、细化普通住房标准等。1400余字的通知瞬间扩散,犹如一滴水落入滚油,深圳楼市“炸开了锅”。

几分钟后,德佑房产中介小王注意到了微信群里不断弹出的消息。他正带着客户李梦走在看房的路上。李梦之前已经看中了一套房子,这是她第三次看房。《通知》让小王停下脚步。“深户居民家庭、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须在本市落户满3年,且能提供购房之日前在本市连续缴纳36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



明,方可购买商品住房。”小王面对李梦,逐字念出了这段条款。

新政出台,购房资格蒸发,李梦措手不及。她掏出手机,搜索公众号,点开首篇文章,一



口气读到最后，末段的那句“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戳破了她最后一丝希望。

29岁的李梦是山东人。2019年5月，她的丈夫因为创业来到深圳，10个月后，她也追随

市民在深圳南山区后海片区望着已建成或建设中的楼盘

南下。符合人才引进落户政策，有合适的工作，买房后孩子有机会上好学校，是他们决定移居深圳的主因。刚刚落脚，李梦便开始寻找合适的房子。在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后，夫妻俩将购房范围锁定在光明区。

光明区位于深圳市西北部，靠近前海和宝安中心区。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公布，提出要“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而光明科学城被确定为港深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在“双区叠加”、“世界一流科学城”、“深圳北部中心”等规划概念的推动下，光明区登上房价暴涨的前线。

在李梦开始看房的3月，深圳楼市已近沸腾。来自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3月深圳二手房成交套数为8008套，较去年同期增长59.11%。据贝壳研究院数据，3月光明区房价相比去年上涨45.4%，涨幅全市最高。

房价的跳涨让李梦心慌。为了尽早“上车”，她在疫情期间以低于市场价8万元的价格，处理掉了在山东的房产。这笔房款再添上三十来万，李梦和丈夫希望能在深圳拿下一套总价320万元左右的二手房。为避免逾期违约的风险，李梦没有在落户深圳后立即买房。她计划等老家卖的房款7月底全额到账后，再支付定金，但突如其来的限购政策，让他们失去了购房资格。

李梦的经历并非个例。小王同时跟进的15位客户中，多数如李梦一般，被新政中“入户时长不够”的槛挡在了门外。

在此之前，深圳市执行的限购措施，对深户居民没有落户时间和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的要求，居民落户即可购房。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7月15日还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深圳推出八项措施精准调控楼市》一文，对限购政策调整的背景作出解释：“近几年，我市落户即可购房，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供需矛盾，这对于早期已落户深圳并连续多年在深圳工作的市民也不公平。因此，在住房供需紧张背景下，

适当收紧户籍居民购房政策，以切实支持合理自住需求。”

## 损失5万元退掉了“百里挑一”的房子

不同于失去了购房资格的李梦，艾米在7月15日的政策出台后，基于对未来房价下调的预判，主动放弃了7月1日定下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70平米，位于罗湖区（深圳中心城区东部）。为此，她损失了一半的定金。“我现在是损失了5万元，但后期或许可以买到一套便宜几十万的房子。”不过，艾米还是觉得“堵得慌”，“那些钱够买好几个LV（包）了。”



左图：2020年7月26日，黄建朋在深圳民治街道带客户看新盘  
右图：2020年4月，黄建朋的同事经手的一套位于深圳龙华区的房产。这套77平米的二手房后来以425万元的价格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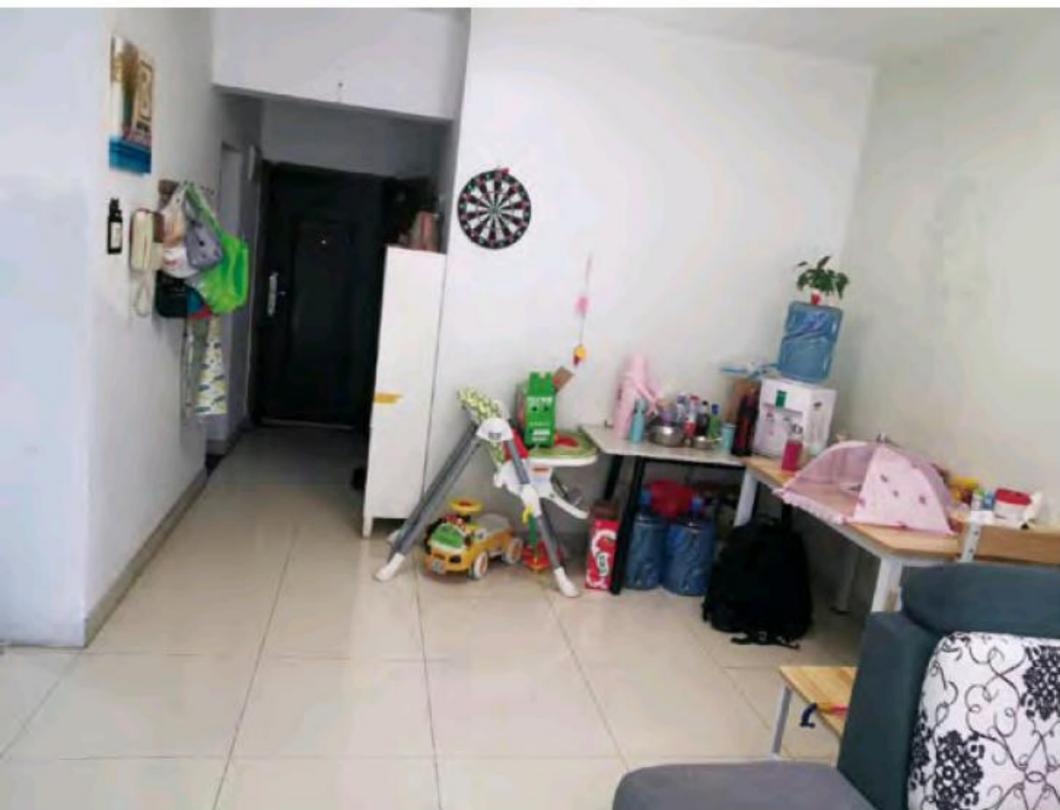
广东人艾米和李梦同岁，七年前来到深圳工作，结婚生子后成为一名家庭主妇。那套被退掉的房子是她过去三个月间，从一百多套房子中筛选出来的。换房的决定是4月做出的，各大平台上持续上扬的房价曲线、时隔四五年后重新活跃的买房交流群，让艾米都嗅到了和2015年相同的气息。

2015年到2016年是深圳近二十年经历的第三轮房价暴涨周期。据《北京青年报》2016年

1月的报道，2015年深圳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价格涨幅均超四成。在全国市场普遍低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深圳楼市一枝独秀。

怀着“再不上车就上不去”的心态，2015年底，艾米和丈夫在深圳添置了首套房，那是龙岗附近一套50平米左右的二手房，入手价为110万元。高位“上车”的担忧因2016年一季度房价持续上扬而消散。2016年上半年，深圳房价收入比高达38.36，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全球“最难买得起楼”的城市。

根据以往经验，艾米推断深圳房价已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至少会涨到明年。”最近几



个月，她所在的几个楼市交流群每天都会产生上千条信息，“聊的全是房子。”

2020年4月，在邻居的建议下，艾米将那套小户型挂牌288万元售卖，两个月后卖出。相比前一年，这套房子的市价上涨了二三十万，虽然比不过核心区新房的涨幅，但艾米已经“满足”，“那个房子比较旧了。”

在卖房时，艾米也在同步看房。两年前，孩子出生，她希望置换一套大点的房子，改善

居住环境。相比卖房，买房压力更大。因为没有人帮忙照看孩子，艾米常常要推着婴儿车四处奔波。“本来深圳的天气就很热，看房累，看完房回家也吃不好睡不好。”

7月1日，在即将收到卖房款时，艾米终于定下了一套70平米、总价400万元左右的房子。没想到刚刚安稳两周，新政的出台便让她自愿放弃了过去三个月日夜奔波的成果。

因为离职在家，艾米社保中断，失去了在深买房的资格，不过，她丈夫还能买房。虽然丢了真金白银，但她还是把深圳“7·15新政”评价为“一个好政策”。她不再像之前一样着急买房了，“最少要4个月之后再买，我会耐心等着笋盘（指低于市场价的性价比高的房子）出来，等那些投资客资金断裂。”

新政推出后的第一个周末，艾米去参加了一个线下的楼市分析会，那是一个投资房产的朋友介绍给她的。此前，她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我需要了解未来楼市的走向。”7月23日凌晨，艾米告诉本刊记者，她已经停止看房。前段时间买卖房子耗费了太多的心力，她打算先休息一阵，“至少要跌10%我才会下手。”

### “房源少了，看房的人也少了”

“冷淡”是黄建朋对新政后深圳楼市最直观的感受。他是龙华中中原地产的一名中介。“很多房源下架。不少业主卖房原本是为了在更好的地段置换，如果卖了买不回来，就不愿意卖了。也有部分卖房的业主，心态明显没有之前强硬了，原先不愿谈价的，现在也有商量的余地。买房的客户也明显减少了，之前的客户里起码一半失去了资格，另一半很多也不愿意出来看房了。一来是因为房源减少，二来因为调控，买家也不会为房价上涨而焦虑了，会再等等看，或者转而关注一些价格更低且带学位的新房。”

黄建朋有一个客户，原本想以628万元的价格卖掉位于龙华的一套自住房，然后到南山或者前海置换一套1000万元左右的房子。如今因为贷款首付比例和增值税征免年限的提高，这名客户需要多掏几十万元首付款。考虑到房

价存在横盘或者下跌的不确定性，客户中止了换房计划。

黄建朋认为这是较为普遍的情况，“房子本来就是买涨不买跌。”截至7月22日，新政推出后的一周内，他的带看量为1，成交量为0。

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公布的数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企业二手房网签量经历了2020年第28周（7月6日至7月12日）峰值的10023套后，在第29周几近腰斩，降至5143套，到了第30周，这一数据下滑到1700套（含自助网签）。

和黄建朋一样，广东人林玲的工作同样因新政受波动。她于2012年来到深圳，2016年前后开始从事深圳入户咨询服务行业。据她了解，2020年上半年，有不少外地投资客到深圳投资房产。根据深圳的入户政策，四类人才可以“秒批入户”，其中包括4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以及35周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人员。

“7·15新政”出台后，林玲的两名客户决定放弃入户申请。“他们想通过入户来买房。现在新政策出来，入户后还需三年社保，考虑到时间成本比较高，就不办了。”林玲认为，入户业务所受影响是两面的，也有一些在深圳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因为购房新政对户口的要求，反而会比之前更积极地申请落户。

在深圳的8年里，林玲结了婚，生了子，一直租房。“赚的永远赶不上房价，是挺焦虑的。”在她看来，调控政策虽然对办理入户的客户量会有影响，但长期来看是有益的，“不然（像上半年）这样涨得太快，很多人的心都在炒房上，就太浮躁了。”

“楼市就是政策市。”黄建朋2019年初进入房地产中介行业，2020年上半年，他第一次经历房价暴涨。最忙的6月，他通常一周工作六天，每两天带一批客户看房，每周末，他供职的中原地产在龙华区的成交量一般为10到20套。如今行情急转直下，他的心态难免波动。“不只

是我，现在大部分中介都是比较懒散的状态了，落差确实非常大。”

最直接的影响是收入。黄建朋目前在深圳租房住，每月房租2100元。他的工资包括底薪加提成，如果没有一定的交易量支撑，单靠两千多元的底薪，很难在深圳生活。“房产经纪人的淘汰率一直都挺高的。坚持三五年也不一定能挣到什么钱。”来深圳五年，他从未想过要在深圳买房，“我肯定是回家买，深圳的房价不是底层群众能够承受的。”

杨习是广东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售楼部经理，2007年来到深圳后，进入房地产行业已13年。他负责销售的楼盘位于龙岗区，尚未开盘，目前处于登记意向客户的阶段。7月15日政策刚出，其登记客户中有六成左右受到影响，17日住建局出台调控细则后，这一比例降至20%。

“无论是带有投机性质的客户，还是刚需客户，上门量肯定是比政策出台前要少。客户也相对冷静一点，以前买一套房，可能看房到交钱最多一周时间，要不然房子就被别人买走了。像之前西部一些盘，甚至要摇号，三四百套房九千多人认筹，根本没时间考虑房子的朝向、



深圳前海嘉里中心顶层的参观者

地段、楼层、采光等等。如今，客户能有多一点的时间来选择和考虑。”

## “误伤”：被改变的生活轨迹

杨习的客户中，受新政影响的主要是那些投机买房或近期转深圳户口的群体，那些换工作不太重视社保的人群也被“误伤”。

如今，李梦和丈夫均为“全国范围内名下无房”的状态，她认为，这足以自证“刚需”。她介怀于失去了一张深圳的“房票”，还有通过买房让孩子进入一所满意小学的希望。

她的孩子2021年将到上小学的年龄。她卖掉老家的房子到深圳，是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也不愿两地分居。确认失去买房资格后，她立马开始研究学位租赁。

一直以来，深圳都面临着招生地段内生源超过学校招生能力的问题。2019年11月，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就曾发布过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生学位预警，根据其在9月启动的2020年全区学位需求调研，预计小一适龄儿童32807人，小一学位总缺口近8000个。2014年，深圳市开始全面推行积分入学管理办法，对深圳户籍和符合深圳市就读条件的非深户籍儿童入学实行统一积分，并根据积分情况统一安排学位，其中户籍和房产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2020年，李梦所在的龙岗区小一学位申请的学区积分，由基础分和加分两部分组成，满分为110分。基础分依据孩子的户籍类型和居住情况分为七类，从100分到60分不等，“100分”要求“龙岗户籍+学区购房”或者“学区户籍+学区祖屋”，而“60分”则要求“非深户籍+学区租房或有特殊住房”。

不同学校的录取积分各不相同。按照李梦从中介处获取的一份名为“龙岗区2017-2019年小一网上报名录取分数”的统计表，2019年录取分数线最高的是“布吉街道贤义外国语学校（公办）”，分数线为105.35分。除分数线外，表格里每所学校后面还细致标出了各种额外的考核要求，比如不动产证登记时间、租赁材料备案时间、社保月数、学区户籍迁入时间等等。

研究后的结果让李梦有些受挫。“并不是租到好的学位房就能上好的学校。如果是买房，基础分达到100分，可以申请最好的第一类学校；而租房的深户基础分则在70到75之间，要保证录取，只能申报第六类学校。”

李梦认为小学生涯会影响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选一所优质小学非常重要。但现实是，她必须降低预期。新政出台后的一周，她依然奔波于各种房屋信息中。根据“居住加分”政策，提供房屋租赁凭证的，按房屋租赁凭证备案时间加分，每满一个月加0.05分。

“目前很多刚需不能买房，租房人数上升，租金上涨是难免的。”因为租房涉及学位锁定，很多业主会额外收取一笔“学位占用费”，李梦从中介处了解到，往年的行情通常在0到1.8万元不等。然而，她在7月19日看上的一套房子，房东直接开出了4万的高价。截至7月25日，李梦依然没能租到合适的带学位的房子，她和丈夫决定先租间房住下，下半年再找，“肯定是要搬上一到两次家了。”

如今，李梦五岁的孩子还留在山东，由亲戚帮忙照看。买房结束分居的计划搁浅，她觉得“对不起孩子，我们为了自己的工作，影响孩子小学前三年的教育，甚至必须异地”。

和李梦一样，方晨也将自己归为被政策“误伤”的“刚需人群”，她是十几年的“老深户”了。

方晨来自东北，2006年到深圳大学读书，户口同时迁入深圳，毕业后留深工作。丈夫冯兴与她情况相同。2016年，冯兴被公司调回杭州总部，同在一家公司的方晨陪同调职。2019年8月，二人结束调遣，返回深圳。期间三年，方晨和冯兴的社保都落在杭州。

2020年6月，因为公司搬至南山区，考虑到通勤来回四小时，以及孩子上幼儿园的学位问题，夫妻俩决定卖掉2012年在深圳盐田区购入的一套新房，在南山区置换一套小户型二手房。7月8日，房子以近500万的价格卖出，二人开始马不停蹄地选房。方晨计划8日（周三）卖完房，最好周末就能把买房合同签了。可过程的坎坷超出了她的想象。





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内,游客享受休闲时光

“小户型的房子本就紧缺，稍微好点的，大家都想拿下。我们的预算只有750万，后来被逼着上调到900万。可即便这样，最后也没买到。南山、宝安的业主大都心态高，他看你想买就反价，要么就是约好了谈价，临时爽约。”方晨介绍。

新政出台前一周，方晨已被连续爽约三次。最近一次就发生在7月14日晚上。原本约好当天下班后敲定合同、支付定金，结果他们夫妻却等来了业主爽约的电话。两人不想放弃，待到晚上10点多，又选中了一套房子。因为业主是名巡警，在值班，约谈推到次日。到了7月15日，他们没等到业主，却等来了限购政策。

微信公众号“深圳住建头条”7月17日发布“热点问题解答”，明确了“深户已缴3年以上社保，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导致社保断缴，不能买房”。方晨今年买房的希望彻底“凉凉”。

这些天，除了抓紧时间弥补之前因为卖房、看房请假而耽误的工作，夫妻俩当务之急是先租个房子，把一家老小安顿下来。

“计划好的生活全被打乱了。下个月从房子里搬出来，我们就没有红本（房产证），变成了租客，也不知道会租在哪个区，居住地更换会影响孩子入学的积分。”方晨觉得自己目前处境很尴尬，“十几年的深户，卖了深圳唯一的房子准备置换，然后突然失去了买房资格。等到两年后社保满三年，现在卖房的钱还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政策出台后，方晨夫妇也曾考虑过换个城市，比如回杭州，那里房价比深圳低，今年9月之前两人的社保缴纳记录也符合当地的购买条件。然而，除了工作调动不便，他们还是喜欢深圳，“我们在深圳生活这么多年，读书成家都在这。这边的气候、城市发展都比内地强太多。”

虽然才来深圳不久，但和方晨一样，李梦也喜欢这座城市。“我不后悔来深圳，我觉得这是适合我们90后奋斗的地方。很多新落户深圳的人，都是为了工作和理想而来，希望工作和

家庭能够齐头并进，不是失衡发展，面临资产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制约。”

## “被倒逼的调控”

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看来，深圳此次调控打压的是投机炒作，对合理的住房消费、长期投资需求是支持和保护的，但任何公共政策它都有外部性，“误伤”无法避免，也很难判定，“因为在深圳，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刚需’，多少都带有投资属性。”

不过，李宇嘉7月17日发表的《深圳楼市调控，本不必下猛药》一文里，也对政策提出了疑问——“这次调控是不是不用这么大动静，是不是本来可以避免，或者更早一点出台调控？”

他认为，2019年以来曾经有三次时间节点，如果能提前以“1年落户+1年社保”这样较为缓和的政策对冲，或许可以避免出现2020年5到6月深圳楼市“失控”的局面。

李宇嘉向本刊称，调控政策何时出台背后是相关部门“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前没有出台调控，是因为弊大于利，后来再不调控，炒作的泡沫就更夸张了，所以是利大于弊。”他将“7·15新政”形容为“被倒逼的调控”，政策到了不得不出时刻。

一方面，房价涨得太快。2019年底，得益于取消豪宅税，以及深圳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利好政策的影响，深圳二手房均价时隔四年再度超越北京，重回全国首位。2020年上半年，虽然受疫情持续冲击，但基于货币发毛（货币贬值）和对政策松绑的预期，深圳楼市开始出现“魔幻般上涨”。

“上半年收尾的6月份，从过户数据来看，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套数为10594套，环比上升23.9%，成交面积为90.6万平方米，环比上升28.0%。而这个成交量是2016年4月以来的最高峰。上次‘破万套’，还是2016年3月，那是近10年来深圳楼市最火爆的时期。”李宇嘉介绍，3月以来，新房市场也频频出现“日光”、“秒光”的现象。

市场的火热同样体现在成交价上。据中国

房地产业协会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房价涨幅榜》数据，深圳6月二手房均价达到74929元，相比去年年底上涨14.37%，位居全国涨幅榜次席，二手房均价分别超出北京20%、上海36%，是广州的2.09倍。如果从2019年“双11”算起，部分热门区域的房屋（特别是光明、南山、福田、宝安中心区的学位房）价格上涨幅度甚至达到60%到100%。

在李宇嘉看来，政策出台的另一个原因是投机炒作泛滥，已经触碰到了“房住不炒”的底线，比如暴力拉升、集体护盘、假结婚、假离婚，过桥贷、经营贷等操作屡见不鲜。

“这样上涨是受不了的，可不断还有人接盘，我们都觉得危险。”资深房产投资顾问Cody 2009年来到深圳，已在房地产行业浸淫十几年。7月14日，他的同事就见证了一桩“典型”案例。

当晚，客户和业主原本约定就一套市场价1950万左右的房产进行价格磋商，谈到2000万时，业主同意成交。但在签合同之前，受小区其他业主抱团抬价的提议影响，业主临时反价，再涨200万。客户不同意，一拍两散。

“15号政策一出，双方都陷入了被动局面。原本客户想去办假离婚，把首付从五成降到三成，但现在新政（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三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家庭有1套买普通住宅首付70%，非普通住宅80%）出台，他们家里还有房，离婚与否，首付都被拉到了80%，再算上增值税，就换不起了。业主那边，政策出台后，接盘群体减少，增值税抬高，之前的高价也无可能。”Cody回忆。

在Cody看来，这种现象在深圳并不少见，而且并非今年的特殊现象。“这一次的政策可以看作是为之前的政策漏洞打上补丁。目前，市场还普遍处于观望状态。”

“至少短期内，7·15新政能把户籍炒房控制住。这剂猛药下去，楼市稳定住了，但也要防止下跌，稳字当头也是楼市的调控目标，这将考验下半年深圳的政策。”李宇嘉说。

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预计，“7·15

新政”调控影响将分两阶段梯次显现：第一阶段为政策剧烈反应期，即成交量在短期内将会大幅度下跌，同时中介带看量也会明显下滑；第二阶段为政策消化期，即一般自新政发布起2-6个月，其效应方逐步在房地产价格上体现。“7·15新政”的影响力将在今年国庆后才会完整显现。

本刊记者曾于7月22日联系深圳市住建局，但工作人员表示，相关细则还在逐步完善中，暂不方便接受采访。

## 深圳难题

2019年，深圳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在《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和房价调控》（下称《调控》）一文中曾提出，“房价快速上涨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房地产不仅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和保障政府正常运转的重要来源，对于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城市居民住宅及生活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深圳的房价失控和短期暴涨不仅会引发民众不满，带领全国房价上涨，也可能带来房地产泡沫，提高金融等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李宇嘉认为，深圳房价从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暴涨，跟上一轮暴涨（2015年至2016年）背后的逻辑相似，“都是货币宽松，加上杠杆被用到了极致。”

据张思平在《调控》一文中对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下半年深圳房价失控的描述，那个阶段，“深圳每平方米价格实现了‘万元三级跳’，即从每平方米20000元以上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元以上。”

据张思平回忆，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下滑的“新常态”，房地产“去库存”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不过，深圳房地产市场并不存在供大于求、库存严重的问题，反而是需求旺盛，供应不足，房地产投机、投资现象严重。然而，当时深圳市在贯彻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没有考虑本地实

情，而是照搬了国家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去库存政策，从金融信贷、购房限制等方面，全面放开了对需求侧的调控措施，鼓励市民积极购房。加上2015年上半年全国股票市场火爆，相当一部分股票市场的盈利被注入房地产市场。深圳楼市进入疯狂失控时期。

“直到2016年10月4日，深圳市才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实行各城市差别化的调控政策，出台了‘深八条’，实施严格的限购限贷政策，并对房地产市场秩序进行整顿，依靠行政审批房地产商品售卖价格等手段，强行压住了深圳房价迅猛上涨的势头。”张在《调控》一文里写道。

“相比上一轮暴涨，过去几年来深圳的城市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种新推出的规划也更容易被炒作。”李宇嘉认为调控本质上是短期的权宜之计，“尽管7·15的力度很大，但楼市基本面并未改变，比如供地偏少、有效供应不足、货币充裕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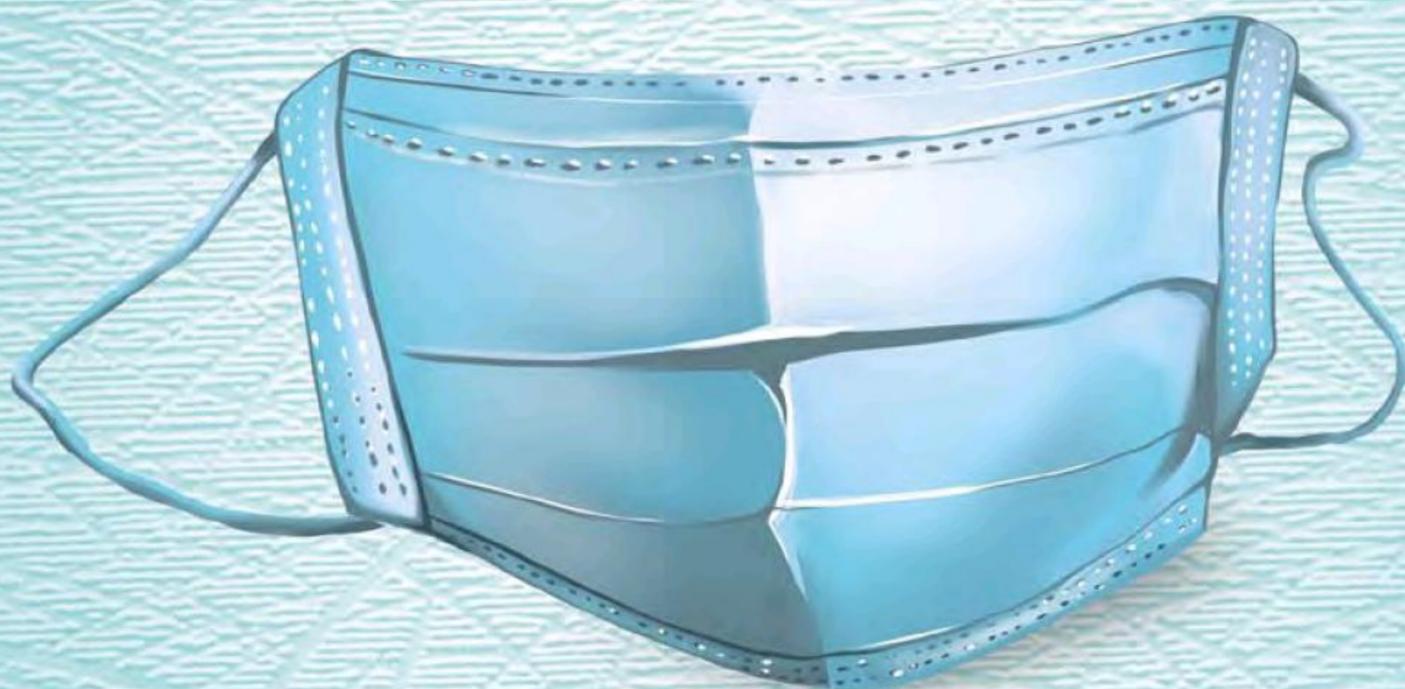
深圳供需两端的矛盾凸显，也让调控的难度大幅提高。根据公开数据，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城市面积分别约为16410平方千米、6340平方千米、7433.93平方千米、1996.85平方千米，而人口面积则分别为1664人/平方千米、4765人/平方千米、1950人/平方千米、6274人/平方千米。

李宇嘉认为，一方面，深圳自设立特区以来，一直推崇开放和包容，“孔雀东南飞”，鼓励外地人来深创业，分享城市红利（包括买房），入户门槛在一线城市里最低，背后有其历史沿革和与众不同的城市定位；另一方面，深圳的城市体量太小，经济空间受限，加上创业型城市提倡冒险精神，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加重了楼市的复杂性。

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未来，深圳将承担更多的重大发展任务，如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座城市还有很多路要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小王、李梦、艾米、林玲、方晨、杨习、冯兴均为化名）

# 戴口罩 预防新冠肺炎



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办公场所，  
乘公共交通工具、电梯，家有医学观察者，  
到医疗机构就诊等，请佩戴口罩。

中宣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 西海固之旅

图、文 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mailto:rwzkphotos@vip.163.com)





去往九彩乡的路上

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地处黄土高原，由于极度干旱，有“苦甲天下”之称，在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去年8月下旬，我进行了一趟西部之旅，把西海固作为其中一个目的地。出发前，我看了一些早期影像，那里的荒凉和贫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当我驱车抵达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西海固9个贫困县区（西吉、原州、海原、同心、盐池、红寺堡、泾源、隆德、彭阳）中，至今已有8个脱贫，只剩下西吉一个贫困县。

### 2019年8月25日 晴转阴

早晨，天空湛蓝，浮云飘逸，公路如黑缎带般蜿蜒起伏在绿色的丘陵间。

红寺堡区位于烟筒山、罗山和牛首山三山之间，是全国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区。新建的砖瓦房成片地分布在公路两旁。

在长着芒草和碱蓬的旷野上，不时见到昔日的土坯房废墟，残垣断壁上布满斑驳的青苔。沟壑间，空空的窑洞仿若在风中诉说的嘴。

在一簇草丛旁，我发现一处用水泥和红砖修筑的水窖，里面还残留着未用完的水。在缺水的日子里，村民在深深的地底挖出水窖，把雨水和雪水收集起来，然后才能在漫长的干旱中，靠着这种苦涩的水生存。

一个小伙子骑摩托路过，他从六盘山搬来这里不久，正在熟悉周边环境。他指着一大片移民新村说，那里预计安置3.4万人，现在入住了一千多户。他穿着干净的迷彩服和牛仔裤，摩托后座上挂着一个崭新的帆布褡裢，上面印着“一路平安，吉祥如意”。一辆工程车从我们面前驶过，扬起黄色的尘土。“最近几年政府搞生态保护，山绿了，雨水也多了。”他看着远处的罗山说。

在旱天岭的移民新村，我看见一对父子在院子里砌院墙。老人74岁，以前一家人住在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山坳。他弯下腰抱起一摞空心砖放在墙头，儿子拿起其中一块码在墙上，然后用抹子往砖缝里填了些泥。老人的两个小孙

子在院子里玩一根接在水龙头上的橡胶管——他们不用再像祖辈那样，守着水窖过活了。明天，渐渐起高的院墙就可以完工了。

一位留着山羊胡的老汉守在我车前。他牙齿稀疏，目光深藏，胸前扣眼儿上系着一根麻绳，麻绳另一端揣在口袋里，不知是钥匙还是怀表。他用一双粗砺的大手反复抚摸拍打我的车，像是在挑选心仪的牲口，嘴里发出啧啧惊叹。浓重的西部口音中，我只隐约听出“家里坐嘛，家里坐嘛……”我还要赶路，谢绝了他的好意，他显得有些失望。虽然没到他家坐坐，但他的音容伴了我一路，引擎盖和车窗上都留下他油乎乎的大手印。

到达同心县城后，我直奔同心清真大寺。清真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寺院坐落在空旷的高台上，拾阶而上穿过拱门，进入主院落，院子里静悄悄的。礼拜大殿前摆放着一排排鞋，我正疑惑间，殿门洞开，做完礼拜的男人像潮水般涌出，转眼又消失不见了。

去旅馆时，我走错了路，在一条小路的街角把车停下。一个年轻人从路边商铺出来，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死死盯着我。我感觉受到冒犯，用同样的眼神回敬他，他避开我的目光。我准备倒车重新回到主路。“别倒！”小伙子喊道，他扬起下巴。这时我才发现头顶的交通违章摄像头。我挂上D挡，冲他喊“谢谢”时，他已经转身回了商店。

傍晚，天色开始变得阴沉。步行街餐饮店的“M”字招牌远看像麦当劳，走近发现是“快乐麦肯”。

文化广场上，人们三三两两，散步，聊天。我也找了一个石墩坐下。女人们头上戴着淡紫色包头帽，穿着阔脚裤和细细的高跟鞋。一位老人看出我是外地人，坐下跟我闲聊。老人是海原人，在同心做了二十多年小本生意，路灯下停着他的摊车，上面摆着一袋袋筒装月饼，中秋节快到了。老人有七个孩子，虽然已76岁，却仍在奋斗，赚钱供最小的孩子上大学。灯光昏黄，我看不清老人帽檐下的脸，他说话的语调没有起伏，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旱天岭移民新村, 砌院墙父子



同心清真大寺, 做完礼拜的男人



西吉,乡路上的女人



同心县一家面食店

## 2019年8月26日 雨

雨下了一整晚，街道上湿漉漉的。早餐吃的是土豆馅包子。在西海固干旱缺粮的日子里，土豆是救命粮食，既是主食又是蔬菜。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离开同心，沿着湿滑的高速公路向南行驶，没多久就到了海原县。整个县城被阴云笼罩着。一群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人，给单调的街道增添了一抹亮色，她们穿着入时，戴着薄纱绣花盖头。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站在路口，挥舞手中的小旗维持交通秩序——实际上，街道上的车辆与行人并没有多到需要维持秩序的程度。

我打算去九彩乡看看，这个名字让我充满想象。

连绵的雨，延绵的山，一座座梯田环绕的山丘，仿佛绿陀螺在雨雾中旋转。一个浑身湿透的男人跑过公路，寻找他的羊；一棵向日葵躺在公路上，碾碎的花瓣被雨水冲得四散。

雨滴汇成细流顺着引擎盖和车窗流淌，旱天岭老汉的手印像符咒般粘附在原处，没有被冲刷掉的迹象。

过了马圈村不久，突然堵车了。一辆大货车陷入泥泞，横在乡道上，司机却不知所踪。导航显示，距九彩乡还有6公里，我站在路边湿滑的陡坡上，朝九彩乡方向望去，除了雨幕中模糊的山影，什么也看不到。我调转车头，朝固原方向驶去。

下午两点，抵达固原，雨停了。

固原曾是丝绸之路北段关中通往西域的要道。我登上修复的古城墙，雨水把城墙冲刷得灰亮，一座八角亭孤零零立在甬道中央，人很少，一对情侣坐在城墙尽头，望着眼前挡住视野的高楼，沉默不语。

顺着人民路闲逛至南河滩市场，牛羊肉店铺林立，戴着白帽的男人在店门口肢解牛羊；一个女人蹲在路边打电话，面前放着两大袋雪白的馒头；一群老人在蔬菜大厅的角落里下棋，我看了一会儿，没看明白，一个观棋的男人告诉我，这是发源于固原的方棋，少说也有几百年历史。

## 2019年8月27日 晴

西吉离固原只有一小时的车程。县城到处都在施工改造，地上和树上落着黄色的尘土。一个乡下男人肩上搭着两辫子大蒜，在商业街附近来回溜达，寻找买主。他戴着高度近视镜，裹着半截防风护腿，一脸茫然。商业街立着建筑围挡，只留了一条细狭的小道供人穿行。一个女人抱着孩子，透过围挡的缝隙向内张望，挖掘机和铲车隆隆作响，孩子忽然哇哇地哭了。

离开西吉，沿202省道向南，接连穿过硝河、将台堡、兴隆三个乡镇。

将台堡纪念广场高耸着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纪念碑建于1996年，是为了纪念1936年红军长征三大主力军在此胜利会师。

将台堡集市上，人车汇聚，买卖的多是服装和日用品。一些稀奇的事物吸引了我：在一个镶牙摊上，一位老人摘下假牙，摊主用手涂上粘接剂修补，其他老人在围观等候；一名老妇人在路边卖一种号称能治病的虫子，因为她的虫子吃的都是上好的食物，在她面前的纸盒里，乌黑锃亮的小甲虫密密麻麻爬在核桃、大枣和红花上。

在兴隆镇单南村，我离开省道，向东驶往一条窄路。路过单南牲畜交易市场时，已是中午。在称重区，一群男人正奋力将一头公牛往围栏内的秤上赶，公牛极不情愿，它瞪着眼睛，尾巴翘起，但每次挣脱都是徒劳，地面上满是湿滑的牛粪，它根本站不稳。就在快被赶到秤上时，公牛猛然挣脱缰绳，疯了似的冲向刚经过的一头母牛，骑在它背上。几个人跑过去，生拉硬扯地将它们分开。母牛在牛粪中跺着脚，发出低沉的哞哞声。

我驶上的这条路叫好兴公路（好水—兴隆），可是它让人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公路正在扩建施工，土路尚未铺石子和沥青，雨水积满每一处坑洼与车辙，我像驶入沼泽地，只能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行驶。后面一辆白色SUV紧贴着我的车身超了过去，很快就没影了。我轧着它的车辙，审慎前行。



单南牲畜交易市场

大约五公里后，我看见了那辆 SUV，它陷在路中间。我停下车，外面都是淤泥，无法下脚。SUV 里有四个人，两个年轻人下来推车，后座有个戴眼镜的男人将头探出车窗。两只后车轮在空转，越陷越深，司机下车跑进旁边农舍，找来一把铁锹，年轻人搬来路边的石头。半小时后，他们才脱困。

下午 3 点，驶出好兴公路后，我长舒一口气。我把车开进文昌街的一家洗车行，洗车行的女人始终闷头干活，没问我从哪儿来。我坐在路边看风景。在这个山区小城，我呼吸着来自六盘山的清凉空气。洗车用了近一个小时，那些冲下的浑浊黄泥需要用铁锹铲走。

傍晚我在城里转悠，新建的隆德县博物馆

和图书馆看上去颇有气势。街道两侧，可以看到各种“书画室”和“书画社”的招牌。隆德长期受到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民间艺术丰富，是西北有名的“书画之乡”。

街角有家清真面馆，我走了进去，里面摆着几张厚重的榆木餐桌，一面墙上的镜框里裱着长幅书法作品《沁园春·雪》，我在窗边坐下。一辆农用三轮车停在马路对面，一对夫妇领着孩子风尘仆仆走进来，他们研究了会儿菜单，最后点了三碗拉面，安静地吃完后，匆匆离去。孩子和母亲爬上堆满货物的车斗，父亲发动了三轮车。看着他们的背影远去后，我的目光又落在那三只干干净净的面碗上。

明天，我将离开西海固，继续向西行驶。



固原南河滩市场,下方棋的男人



将台堡集市上的镶牙摊



硝河乡,花池边闲坐的老人



海原县城街头



旱天岭移民新村,在院子里玩耍的哥俩



红寺堡,旷野上一处废弃的水窖

## 王元化 敞开的客厅

王元化先生家里的客厅并不大,但它的大门总是敞开的,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这里是学术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的“大沙龙”,也是各界人士云集的“小社会”

太多的朋友,构成了先生晚年生命中的欢乐场景。他不仅是一个大学者和思想家,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辈

特约撰稿 蓝云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王元化先生经常对人说,他很不同意鲁迅先生说的,吃鱼肝油不是为所爱的人,而是为敌人的观点。他说自己虽然十分敬仰鲁迅先生,但是反对这种恨人的哲学。因此,他好交朋友,交游广阔,结交者中既有世界闻名的一流大学者,又有文学、音乐、美术、戏曲等各界名流,还有门内门外的弟子和小辈们,甚至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王元化先生家里的客厅并不大,但它的大门总是敞开的,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这里是学术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的“大沙龙”,也是各界人士云集的“小社会”。

先生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一直做着地下党文委的工作。先生多次说道,他是吮着地下党文委的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的一些成员对先生思想和人格的成长有过重大影响。这些人中有林淡秋、束纫秋,还有我父亲蓝瑛。他们从热血少年到耄耋老翁,尽管身处不同工作岗位,却始终患难与共亲如兄弟。

当年地下党文委过组织生活,地点就在束

纫秋所在银行办公室。1949年后束纫秋先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1957年调任《新民晚报》总编辑(“文革”中《新民晚报》停办)。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任上海出版局副局长兼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这段时间他的最大贡献,是着力完成了《辞海》这一重大出版工程。1980年代初《新民晚报》复刊,束纫秋重新担任总编辑,和社长赵超构一起,继续着他们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理想。

有束纫秋在,《新民晚报》就是先生最愿意发表文章的领地(另一家报刊是《文汇报》)。先生把重游故乡荆州和重访清华园等游记都交《新民晚报》连载,还在晚报开设过一个由他口授、我帮他整理的不定期专栏——“清园谈话录”。在网络没有兴起的年月,《新民晚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先生与我父亲蓝瑛的终身情谊缘于一封信。1939年或1940年的某一天,先生接到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化工作领导人王任叔(巴人)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竺家村



图/雍和

的青年竺宜俊（父亲的原名），说竺宜俊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是可以信任的同志，请让他一起参加地下党文委组织的活动，并请先生对他多加关心。拿着这封信，先生在陕西路长乐路弯弯曲曲的弄堂里找到了我父亲——一个年方 15 岁的少年。

第一次与先生相见，这位兄长的热情亲切、博学多才和理论水平让父亲深为折服。先生鼓励他写作、读书，父亲的不少文章都是先生修改后在上海的报纸杂志上发表。父亲曾对我说：“由于王伯伯的帮助，我真正跨进了学习革命理论以及从事理论写作的门槛。”后来先生和我说：“那时候，我让你父亲写作时起一个笔名，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蓝瑛’。我想，怎么起这么个女人的名字？你父亲说，他是借用了明代画家蓝瑛的名字。”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文委组织的活动很多。父亲还记得《译报》组织了一个“文艺通信站”，地点在陕西北路新闻路转角边的一所小学，一批年轻人一起读书、讨论、出版刊物，十分活跃，而先生就是他们的“头”。到了饭点，

谁身上有铜板，就凑起来买烧饼充饥。

1941 年“皖南事变”前夕，父亲离开上海，奔赴苏中新四军根据地，担任报刊编辑工作。一直到 1953 年春天，父亲母亲才从部队转业来到上海。

1955 年春天开始“反胡风”运动，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先生曾经和胡风有往来，但是他对胡风并没有太多的认同，所以他并不是胡风“圈子里的人”，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他就可以撇清自己和“胡风集团”的干系。但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旗帜鲜明地表态：胡风是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先生坚持不违心，不说假话，结果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大帽子，开除出党。父亲不顾忌旁人怎么看，我们两家人依旧时相往来，依然是朋友。

---

王元化与蓝瑛



父亲总是跟我们说，先生是被冤屈的，他的问题总有一天要得到纠正。那时候父亲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说，“胡风专案组”组长张春桥认定先生态度恶劣，主张从严惩处。但市委另外两位领导王一平和石西民不同意把态度问题作为定性反革命的依据。父亲还跟我们说，周扬表示过，王元化是党内少有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很深造诣的学者之一。话外之音不言而喻。石西民更是对先生表现出特有的关切，他知道父亲和先生走动密切，就常常来打听：“元化先生最近研究一些什么问题？他身体好吗？”父亲如实禀报，并更加坚信，老大哥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文革”前的某一天，石西民对父亲说想见见先生。约定了时间，父亲把先生领到海格大楼，在石西民的办公室里，他们谈了很久。可是到了1966年，新一轮风暴席卷而来。“文革”中，父亲被揪斗，其中一项重点批判的罪名是包庇“胡风分子”王元化。先生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在干校一次批斗会上，先生心因性精神病发作，当众高呼：“我想翻案……”父亲也一次又一次被揪斗，我们从原来的居所被“扫地出门”，一家8口人挤到两间小房间里捱日子。随后又是干校，“上山下乡”。即便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心里仍然关心先生遭遇了什么，但是只能把惦念藏在心里，不再能来往走动了。“文革”结束，先生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往来了！久违了的老兄弟又能够对坐畅谈了。先生的住房得到了改善，搬到和我家比邻的淮海路吴兴路，我们成了“近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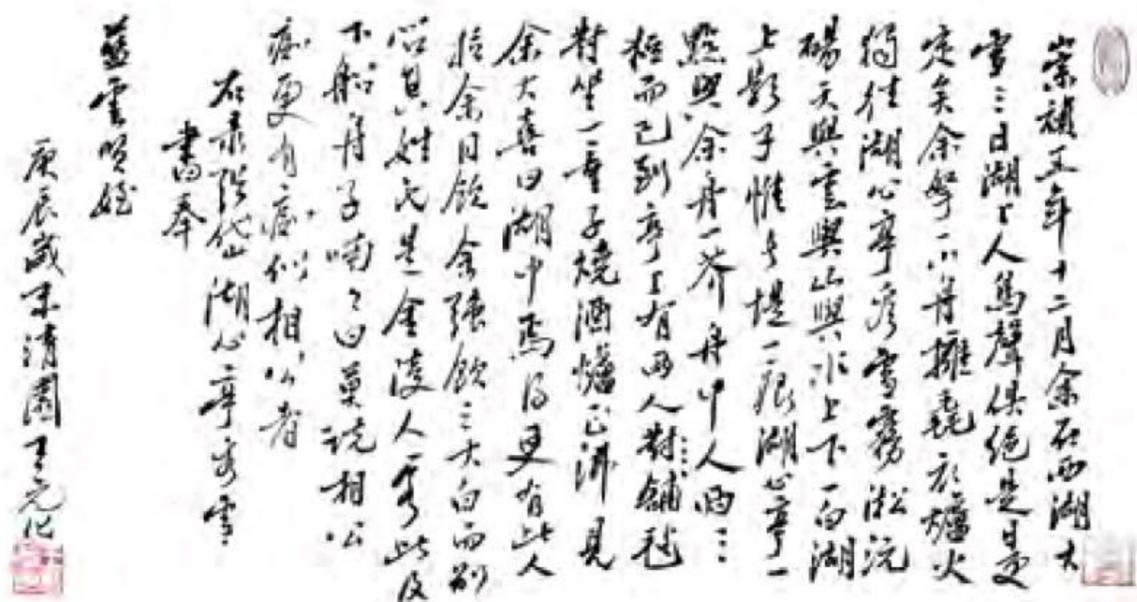
先生病中住在瑞金医院时，父亲要我照顾好他的老哥哥，对我说：“你不要担心我，我还有你妈妈。元化伯伯更重要，他不能离开你。”于是，我在父亲母亲的支持下，每天清早跑先生所住的瑞金医院，带上先生能吃的东西，一天也不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先生离世前一周，父亲带着母亲去瑞金医院探望先生。那时，先生的精力已经耗尽，每吐一个字都非常吃力。但还是紧紧拉着老弟的手，低声对他说：“我们认识已经70年了！”



林毓生

有两位“林先生”，他们是先生在美国的挚友，一位是哈佛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林同奇，另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学思想史学者林毓生。

林毓生和先生交情甚厚，用林毓生的话说，他们是“一见如故”。他俩初次相见是在出席1992年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中心举办的“文化社会：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反思”国际研讨会上。在他们下榻的饭店，林毓生去先生房间拜访，一谈就谈到了午夜时分，整整谈了4个多钟头。林毓生说为什么如此有缘，就是一见之后，元化先生觉得我可以信任，我也觉得他可以信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很玄妙的东西，先于你头脑的分析，也许仅仅是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给你一个直觉，对方是哪一类人，可否信任，这就是人身上的一种气。先生身上“五四”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的气很重，林毓生正是为先生身上的这股“气”所折服。



《湖心亭看雪》

那时候林毓生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写了一本《中国意识的危机》，谈了“五四”时期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这篇文章1986年译成中文后，在国内学界引发了赞同和反对两种声音。那时候，先生还属于后者，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很长的一篇书评《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林毓生读后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反驳寄给《人民日报》海外版，但未被理睬。此事不了了之。之后，香港有报纸同时刊出两方面的文章，形成了一场热闹的“笔战”。但是之后若干年里，先生在1990年代对“五四”精神进行了反思，他的观点彻底发生了转变。

1998年底，先生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邀请，赴台作为为期两周的讲学、访学，得林毓生电话告知届时将偕夫人祖锦出席此会，所以先生决定带着学生胡晓明一同赴会。两位先生下榻于同一饭店，他们已经有4年多未见面了，这回异地相逢，相见甚欢。11月21日《联合报》刊载了这次论坛的信息，大致内容为：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主办的“跨世纪文化反省及展望系列论坛”邀请大陆知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元化及“中研院”院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林毓生来台主讲、对谈。王元化及林毓生昨晚分别抵台。王元化以正直著名，坚持思想应该多元，广受学界敬仰，林毓生对他

也非常推崇。这次论坛的主题“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特色”，即由林毓生和王元化共同磋商后决定。因为这是他们两人长期思考的问题，也希望借由两位重量级学者的演讲及对话，呈现两岸学者对近代知识分子之角色及历史作用的不同反思，同时对下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之角色及历史责任有所期许。在这次论坛上，先生演讲的题目是“知识分子要走的路还很长”，林毓生讲的是“知识分子应发挥的社会力量”。《联合报·文化版》以头版发表了两位先生的谈话。记者介绍先生在大陆是“促进思想现代化的重要人物”，以及先生提出的“学术既需要思想提高，思想也需要学术来充实”。先生说这次演讲自己不如林毓生先生讲得内容丰富、语言简练，自觉讲得“并不成功”。当晚，先生和林先生夫妇一同在餐厅吃火锅，相见甚欢。

及至先生罹患癌症后，林先生来上海就干脆住在先生居住的庆余别墅，希望能多多陪伴老友。林先生还带来了先生心仪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本杰明·史华慈的遗作《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史华慈怀着对人类文明的深刻隐忧，在临终前告诫世人，技术进步和各种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业已成为一种物质性的末世救赎论，而轴心文明时代积累下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在衰落。这一观点使得先

生深受震撼。先生撰文指出：“中国现在实在没有理由为西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内涵的普世理念蔓延感到兴奋！”（《关于〈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几句话》）他在给林先生的信中说：“以赛亚·伯林说20世纪是个很糟糕的世纪，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21世纪恐怕是个文化崩溃的世纪”，“每一想及此事，真是悲从中来，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一无所求，但是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我对19世纪比对20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19世纪文学仍旧是我最喜爱的读物……我在精神上是19世纪之子，是喝着19世纪作家的奶长大的”，“我喜欢19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感情的肯定。”

先生最后的日子，适逢林毓生先生到香港开会，他每天上午都会和先生通电话，也会谈论关于“王元化学馆”的规划。先生的癌细胞已经发生脑转移，听力下降，只好由我接听林先生的电话后，再贴着先生的耳朵逐句转达。2008年初，林先生和祖锦专门从香港赶到上海瑞金医院。病榻上，先生和林毓生先生就中国近代史问题，分两个上午进行了对话。这时候，林毓生先生仍旧谈得洋洋洒洒，而先生却只能勉力而为了。他们的这次对话由严搏非请人整

理出来，先生趁着每日上午清醒时，审读了对话稿清样以供发表。这是先生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先生对史华慈的学术思想甚为倾慕，而他对史华慈的了解主要来自另一位林先生——林同奇。他们相识于1992年，先生去美国参加哈佛大学“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研讨会，与林同奇先生同住在会议安排的小旅馆。早餐厅里，他们不经意地邂逅了。他们一边吃一边闲聊，就这样结缘终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竟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开完会后他们各奔东西，18年间天各一方，再没有机会相见。但是他们保持着通信往来，也时常通越洋电话。先生每有新作问世，都会寄给林先生一本，并在通电话时反复询问是否收到。他们的联系不算频繁，但是按林先生的话说，似乎“有某种思想心灵的神交跨越重洋”。

2003年先生收到第6期《开放时代》，上面登载了林先生所著《误读与歧见之间》，不顾自己眼睛有疾，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他说文章太精辟了，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这是一篇阐述史华慈思想的论文，因为史氏文章号称难读，长期以来中国没有译本。后来史氏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严复》有了中文译本，但是先生对译者是否理解原著、能否译得精准持怀疑态度。而林同奇先生能如此深入、准确、细致地阐明史氏思想，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先生认为这是由于林先生本身的学识才能，加之亲炙史氏日久，对史氏为人治学极为熟悉的缘故。先生立即让我给林先生回信：“从尊文前面阐释史氏的表述方法，可以看出这种表述方法是基于思维方式而来的。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不是简单化的，而是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的。因此，这种隐奥的文笔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是经历了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历程的。只有单线思维，不知怀疑、但求简明结论的人，永远不能理解



王元化和夫人张可



史氏的表述方式以及体现这种表述方式的思维方式。”先生还在这封复信中高度评价林先生对史华慈的研究：“你的文章一上来就用‘抽去思想保留句子形式’的方式，阐明史氏的隐奥文笔，把一个使人不容易明白的问题，阐述得多么好，多么灵巧，这只有像你这样经常接触史氏并对他有着深切了解的人，才能达到这样举重若轻的诠释。”先生还说：“我们这里的一些理论家，只有一个黑白分明单线思考的头脑，所以永远也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写出具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我希望你这篇文章对我们的思想界可以形成一种启示，在一些论者身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如果大家认真地去读你的文章的话。”随后，先生把林先生的这篇文章复制了好几份，分发给周围熟悉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2008年初，先生的病情已经非常危重，他在病中嘱我给林先生寄去新出版的精装本《清园丛书》5册（原定6册，还剩一本《清园谈戏录》未出）。林先生读了这些文章，在电话中和先生交流了他的读后感，准备细读后再深入交流。这时候，我告诉林先生，先生得的是前列腺癌，已经出现大面积转移，正在住院。由

#### 王门弟子探病

于先生的听力逐步下降，电话里的声音往往听不清楚，林先生决定抓紧时间和先生进行一场最后的笔谈。林先生在2008年3月22日的来信中说起，自己细读了先生的《清园丛书》，有5条感想：

一. 我记得章学诚在谈及考据、词章、义理三种学问时曾从人的性情入手提出“考据主于学”需“记性”，“词章主于才”需“作性”，“义理主于识”需“悟性”。章氏的“三性”主要是指天生的资质或“基因”，你甚幸似乎集三性于一身。

二. 你的文章无不发轫于国家民族的劫难和个人生活的遭遇。往往是“灵魂的拷打(煎熬)”与“心灵的解放”并存，是痛苦与欢乐的交集。

三. 你的学与思都体现了熊十力先生的两句话：一是“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二是“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

四. 你的“反思”甚具特色，国内外少见。

我猜想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有关，但也融入了西方典型的求真精神。

五. 我几年来一直在研读史华慈著作，在研读你的著作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到：东哲西哲，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靠近先生耳朵，大声读给先生听，先生听了林先生的来信很感动，立即嘱我拿来纸笔，吃力地逐字逐句口述了给林先生的复信：

同奇仁兄：

非常感谢你以同情的态度、爱护我的心情，对我进行了鼓励性的分析和评价。

我现在躺在医院里，已经有5个多月了，什么事都不能干了，我说自己已经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一个生物人。但我是个唯精神主义者，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不惯，只有隐忍以赴之。

我觉得在治学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就像热爱我的生命一样。你对我的评价说得太高了一些，我只能说我的记性比较好，我现在还能记起我四五岁时候的童年生活，跟我家里的其他人相比，这是比较特殊的。你提到你最近看的那些书，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做深刻的发掘，也没有作更进一步的阐发。那些观点只有几个比较了解我、爱护我的朋友赞同，可是大多数的人反对它们。我自己觉得需要努力的时间还很长，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一些想法说得更清楚一些，让大家可以了解它们。还有很多话，想和你多谈一会儿，但身体虚弱，没有力气谈了。

最后，我想再回应你一条意见，就是做笔记的方法很有用，不要拘于形式上如何整齐漂亮，只要唤起记忆，能够点拨思想就行了。

王元化 2008年3月26日上午10时

如果说先生有一位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一定就是李子云。先生和李子云认识于1950年代初，那会儿李子云是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衍的秘书，先生由宣传部文艺处长调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他们在夏衍主持的会议上常常见面。后来上海市委成立了文艺工作委员会，先生担任文学处处长，直到卷入“胡风案”遭受审查。

子云姐总告诉我说那时候的先生“恃才而骄，颇为自负，不苟言笑，发言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话说‘很飚’才行”！我理解也许作为年轻理论家的先生有点傲气，让子云姐感觉不太容易接近。我问先生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先生却又是一番说法：“那时候她是为夏衍工作的，她的眼睛长得多高啊，她的眼里哪里会有我们？”

“文革”开始，他们都进了“牛棚”。先生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如果老实服罪就可以不受追究。1970年张春桥要在上海进行一次深挖“黑线人物”运动，拟将李子云“挖”出来批斗，李子云也从造反派内部得知，自己将在某日早上“天天读”时被揪出。但那一天，造反派领导在“天天读”结尾时做“杀一儆百”的总结发言：“我警告你们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音未落，只见先生站了起来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李子云顿觉浑身冷汗淋漓，定定地看着先生，真想对他大叫：他们是要揪我，有你什么事儿呢！先生继续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的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斯的分析是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时会场响起一片“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的口号声。这是自投罗网，审问、抄家重新来过，“死老虎”变成“活老虎”，本来针对李子云的批斗转向了先生。

有一天下午，先生突然出走了，说是准备回家去取《莎士比亚全集》，某些造反派极端分子正好想借机扩大事态。幸亏当时未进“牛棚”的茹志鹃挺身而出，说了公道话，说先生在“胡风案”发生期间曾患过精神病，要求造反派先把先生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做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再行惩处。到医院后，先生又碰巧遇到一位有良知的医生，他给先生下了“心因性精神病”的诊断，才使先生躲过这一劫。子云姐说谢天谢地，先生得以回家养病，他们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是子云姐和先生患难与共的经历。

在先生的客厅里，更多的是年轻人。先生以他的思想、学识和人格魅力，引领了一代学人。这里有邵东方、汪丁丁、李庆、夏中义、翁思再，等等，等等。

丁丁和小李每次来访，总是想方设法给先生带一些好吃的食物，因为先生往往一个人生活在工作室，吃得非常简单，仅是果腹而已。而丁丁夫妻俩是十足的“吃货”，他们希望领着先生外出一起分享。一次，丁丁和小李专门带先生去新天地的“老夜上海”吃一餐精致的本帮菜。进了富丽堂皇的饭店，座椅舒适大气，可是，端上来的一个个硕大的盘子里，盛着的却只是小小一份色泽诱人的家常菜。比如葱油拌面，大盘子里只是盛着一小筷子面条加上一撮炸成金黄色的葱花和几颗虾米，虽然色香味俱全，先生还是直摇头：“真是太洋盘了！花的都是冤枉钱！丁丁啊，你不会吃！”当然这并不妨碍在上海和杭州，先生和“不会吃”的吃客丁丁，经常在同一张饭桌上会客聊天，这也成为先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乐事”。

夏中义在先生眼里，是最能“读懂”他的人。2004年开春，寒意未退，但先生表现出热情很高的样子。原来是一篇解读和评论他的文章，令他兴奋不已。此文将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编辑部提前送来了校样稿，他越读越有劲儿。文章的作者年龄不算大，是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教授（后任该校中文系主任），之前他与先生素无个人交往。先生对我说，能够如此“读懂”他，这样入木三分地解析他的，他尚没遇到第二人。之前，先生的床头常放着一本封面黑乎乎的书——《九谒先哲书》。先生有时会背靠着床，信手翻阅。这是夏中义借函谒民国时期清华园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9位先哲，自喻“盗墓招魂”，旨在发掘先哲掩埋在清华园的睿智、傲骨、苦泪、悔悟，向21世纪呼唤“魂（学统）兮归来”。正是这位作者，如今把笔头转向了健在的王元化。先生审视涉及其学思的文章，眼光历来犀利，能得到他本人如此这般认同，实属不易。夏中义对先生的诸多剖析切中要害，使先生颇感诧异。

尤其是对1955年先生因“胡风案”遭遇不测、罹患心因性精神病的深层成因，以及日后如何痊愈的解析，合情合理且层层深入，直指病根，先生不得不佩服。他问夏中义：“这病是我得的，后来病好也是我好的，连我自己也弄不清这些名堂，你是怎么知道的？”夏中义笑答：“不都写在你的书里吗？我都是从你的书里读出来的。”先生器重夏中义，尤为重视与他的会面。每次约见夏中义，谈话必定“一对一”，回绝其他访客，关起门单独谈。如果约了夏中义，先生就满心期待，急切等候。有几次夏中义临时有事没来，那就急煞先生了。我劝先生：“不等了，可能什么事情缠身，来不了了了吧。”先生不依，一定要打电话去夏中义家追问。当确定夏中义来不了了，先生就一脸失望，老半天提不起精神。

在先生的学生中，被先生认为最得其真传的弟子是胡晓明。从入先生门下做博士生开始，胡晓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先生。偶尔出差，也不过三五天、十来天的时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后又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先生离世后，他任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长，兼任王元化化学馆馆长。在先生的5个博士生中，他是随时听从召唤的弟子。先生特别赞赏胡晓明写自己的那篇文章——《一切诚念终当相遇》，说是把自己描绘得入木三分。其他人写先生的文章很多，也有写得不错的，但是比起胡晓明的这一篇，总要逊色一些，于是先生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插入胡晓明的这篇文章作为附录。胡晓明还是先生学术工作时需要的帮手。要查找什么资料，只要一个电话给胡晓明，胡晓明就会立即把资料送来——当然还有傅杰。有许多需要先生作的应酬文字，先生实在不能推脱，又实在不想应付的，这时胡晓明是给先生解围的不二人选。记得有位著名画家出画册来求序言，还送了一幅白莲图。先生无奈，就把任务派给胡晓明，晓明二话不说，即刻洋洋洒洒一篇序言交来。先生说：“晓明的赋和骈体文写得真是好，现在有这般功夫的人不多了。叫我是写不出来的，我没有这样的本事。”



胡晓明、陆晓光在先生家留餐

先生的客厅是天下最热闹客厅之一，名流贤达在这里畅谈文化、学术，谈笑风生，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闯入者”，他们在这里各得其所，都有收获，先生也从各路友朋那里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一口纯正北京话的宋连庠老先生经常来先生这里闲聊，告诉先生近来他“客串”了什么戏。先生说，他出身名门，交游广，经常被电影厂邀请去扮演国民党高官，说他有底气，派头十足，还说他是很有水平的语文老师。先生曾经表示要教我女儿娇娇语文，但是一番实践以后发现自己干不了。娇娇参加高考那年，先生就介绍了宋连庠老先生给她补习语文。

还有褚钰泉先生。当时他任《文汇读书周报》主编，先生的大块文章一写毕就吩咐送给他，很快他就会拿出一个大版面刊发。先生说，时下只有这张报纸最好看，褚钰泉办报有水平。后来，褚钰泉应邀为江西有关单位主编《悦读》，果然身手不凡，以一人之力，推出了这本人人看好的杂志。褚钰泉还带着我替先生编了那本《人物、书话、纪事》，那时我刚开始帮助先生编书，没有什么经验，而他像一个大哥哥，耐心辅导我完成了这部书的编排。出版的时候，他划去自己的名字，只留下我的名字。

还有姚以恩，也是应该写上一笔的。老姚扬州大户人家出身，从小就会吃。他的“吃经”吸引了先生。那时茂名路上的“联谊餐厅”延请了淮扬菜大师莫有才的儿子任主厨，老姚带来这个信息，于是先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那儿的常客，很多客人都被先生带到那儿用餐，老姚也总是来做陪客。除了吃，老姚还擅长“咬文嚼字”，先生的著述，大多交由他校读。他是最较真的、令先生最放心的校对者，常人看不出的毛病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事儿往往没有报酬，老姚出力也不为“捞好处”。有时候先生也有点嫌他烦，他唠叨，开了口就刹不住车，先生说“这个姚以恩，实在有点吃他不消”。

龙应台结识先生以后，对先生很有感情。记得一次先生说龙应台给他来信，信中说她在多瑙河游船的甲板上看见一对老人，是一位老先生推着轮椅，轮椅里坐着一位白发老太太，迎着微风和霞光，她蓦然想起先生和阿可阿姨。先生给我看了龙应台写的那封信。以后，她隔一段时间就会写信给先生，包括告诉先生她是否要去担任马英九的文化局长的思虑。卸任文化局长后，龙应台来上海时专门选择住到衡山宾馆，为的是早上可以陪先生去徐家汇公园散步。

太多的朋友，构成了先生晚年生命中的欢乐场景。他不仅是一个大学者和思想家，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辈。

感谢先生这么多年对我的教诲。他从不嫌我才疏学浅，鼓励我积极地从古今典籍中提高自己，特别要求我要多读莎士比亚、罗曼·罗兰、契诃夫、屠格涅夫、杜甫、陆机，曾经专门从家里给我搬来契诃夫和莎士比亚的剧本，要我一定认真阅读。他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我跳着去“摘葡萄”。没有先生，我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图/受访者提供

## 张佳玮的 人间烟火

爱写字的张佳玮是许多网站的早期用户，  
在虎扑上写球评，在豆瓣上聊文艺，  
在知乎上回答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特约撰稿 陈斯鑫 编辑 陈雅峰 chenyaofeng@nfpeople.com

算上各种版本（包括简体字、繁体字和重印的），豆瓣读书在张佳玮名下出版的图书多达45本，数字远超他的年龄。最高纪录是2014年，连新写、重印和翻译在内，一年出了8本书。

“作为一个没有单位也没有背景的自由撰稿人，出书是我的工作。”高产的秘密，他轻描淡写地总结为“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勤奋是事实，张佳玮有多爱写字，从他微信公众号的更新频率可见：从2015年5月19日启用“原创”功能开始，截止到2020年6月27日，1866天内发布2546篇原创文章，日均发布1.36篇。每篇文章少则近千字，多则几千字，阅读数动辄数万，赶上个热点还能刷个10万+。这些数字足以令许多写公号营销团队的营销团队自愧不如。

他的书涵盖了篮球、美食、艺术、小说、历史等诸多领域，兴趣涉猎广泛。

他是许多网站的早期用户，在虎扑上写球评，在豆瓣上聊文艺，在知乎上回答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他没车没房，有很多书。

## 张佳玮是谁？

“张佳玮是谁？”2012年，有人在知乎上提出这个问题。作为知乎第一大V，张佳玮亲自回答：

我1983年夏天生，无锡人。

父母是典型的江南小市民。

……

我从小算是衣食无忧，父母甚是宠爱，不打不骂，我要看书就给买。

……

初中时打篮球很热切。

……

成绩一般般，偏科很严重。文科好，理科差。

初中有位语文老师对我意义重大……她教我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张季鹰的话：“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羈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张佳玮的名字第一次广为人知是在2002年，那时他还在读高中，参加了第四届新概念

作文比赛，拿了二等奖。

上大学后跟父母定了个协议，上学的一切费用自理，条件是父母不要干涉他的自由。结果用自己的稿费租了房子交了押金后，一度钱紧张，“后来等来了稿费，可以买点鸡蛋炒饭吃了，加了点青豆和火腿肠切片，觉得算打牙祭了，吃得特别香。”为此他总结了一条经验：“饿了之后，油的吃了最解馋。”

2004年至2006年，张佳玮先后出版了四本长篇小说。尽管后来自己觉得“都不成器”，但起码他的写作生涯看起来顺风顺水。只是在当时写小说挣不了多少钱，养活自己还得靠杂志或报纸的专栏稿费。

21世纪初正值国内体育媒体空前繁荣，张佳玮喜欢看篮球，于是就尝试写篮球评论。2006年他开始给一些体育杂志写专栏，有了稳定收入。一写就是十几年。

BBS时代的张佳玮十分活跃，早在2004年他就混迹于天涯社区的篮球公园以及当时还叫“hoopChina”的虎扑。他之前在网易叫过“信陵公子”在虎扑为了让老友们认识，ID是“张佳玮·信陵”，因而被人称作“张公子”，一直叫到豆瓣和知乎。

“当然，其实大家叫我涨工资居多——因为听着比较吉利？”

张佳玮的球评在体育写手中属于文采华丽的，经常东拉西扯引经据典，而且对NBA的历史典故、数据熟稔于心，动不动就砸一系列N年前的数据出来佐证他的观点，让人叹服。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太能写了，重要赛事一场不落，有时一天两场大比赛，他可以连写两篇球评。比赛结束后等着看他的球评是虎扑网友的一大乐趣，而他往往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端出质量不错的球评以飨网友。

他的勤奋很快便征服了球迷。

从2004年起，张佳玮总共在虎扑上发布了1768篇主题帖，其中有468篇精华帖。2010年4月张佳玮成为虎扑第一个达到100级的用户，论持续高产他是独一无二的“虎扑大神”。

豆瓣和知乎则让张佳玮找到体育之外的用



《爱情故事》插画:何月婷

武之地。文学的、历史的、艺术的、美食的、社会热点的，大多发到这两个平台。尤其是知乎的问答式互动，似乎刚好承接了他富余的表达欲，玩起来如鱼得水。从2011年7月5日至2020年6月29日，他总共回答了3560个正经的和不正经的提问，获得7330052次赞同，粉丝数超过240万，是知乎第一人气王。

再到后来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换了哪个平台，都是变换着方式写作。

对张佳玮来说，写作意味着自我表达，如果还能顺便谋生糊口，就更好了。“小时候认为写字就是最高级的表达，后来发现也只是众多表达的方式之一。强行将自己所做的行当神圣化，是件挺奇怪的事。所以现在随遇而安吧，每天写点自己觉得喜欢的就好。”

### “喜欢那点人间的烟火气”

张佳玮觉得，饮食比NBA更难写，“因为球赛人人都看得见，用文字传达饮食的感觉则比较难。”

最初写吃的是刚离开无锡老家、在上海读书时，“当时离家远了，吃不到自己想吃的，于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后来的许多文，大概都是这样：本来是自我慰藉用的吧，然后越写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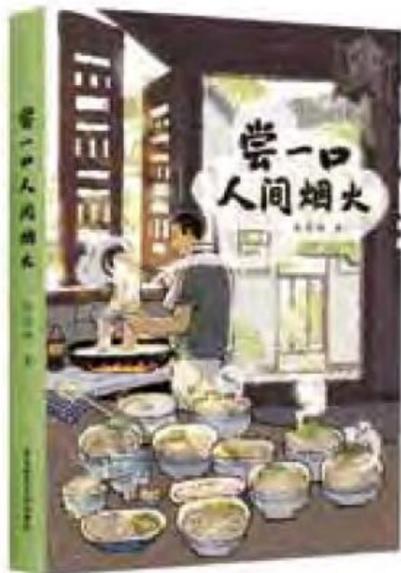
多了。”

张佳玮自称，“我属于会从看的书里找吃的那类人，比如《金瓶梅》里的猪头肉，《儒林外史》里的虾丸和云片糕，《基督山伯爵》里的阿尔勒腊肠和鳗鱼，《骆驼祥子》里的老豆腐……”他的第一本美食文集《无非求碗热汤喝》便是用书本上的美食熬成的汤，有许多天马行空的引用描述作为汤料。

最新出版的书仍与饮食相关，书名《尝一口人间烟火》，他解释说：“因为年纪渐长，越来越发现自己喜欢的，不只是吃，还有吃本身的情景。大概每个人记忆中都有这么个坐着吃东西格外舒适的店，或者某道吃了就觉得真回家了的菜。越是到冬天晚上，越会想这些。说到底不为了吃那口，是喜欢那点人间的烟火气。”

这本书没有配图，甚至连个序或跋都没有，“因为我也不是做美食导航书，写的也不是什么珍奇美味，更多是人情，这个没法靠图片表达。”的确，像书中《汤圆与丧葬》《八千里路云和月》《快手菜和慢工活》《一人一半》《白酒有什么好喝的呢？》等文章，人情多于美味，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食物，却总能带出小人物的小幸福，给人会心一笑的感动。

张佳玮的博闻强识在《尝一口人间烟火》中亦有体现：《天妇罗》一文非但指出日本人吃





的“天妇罗”起源于葡萄牙，也帮台湾的“甜不辣”溯了源；《巴黎的咖啡馆》科普了好几款咖啡名字的由来，并指出咖啡馆在巴黎流行的关键；《布鲁塞尔与布拉格：啤酒的惺惺相惜》则把精酿啤酒的“鄙视链”捋了一遍。

写到《尝一口人间烟火》的时候，张佳玮对饮食的理解更深入，写作风格却反而收敛，变得举重若轻起来，少了些引经据典，多了些普通人的故事，真如书名写的“人间烟火”，接地气了许多。张佳玮说：“可能就是经历到了”。

他喜欢外出觅食，也喜欢自己在家折腾。

在上海时，听说复兴路一家红烧大肠面好吃，就专门去了。到了巴黎，圣日耳曼大道那边有一家号称巴黎史上第一个咖啡馆的地方，听说他们家牛头肉好吃，也跑去吃。

出去吃的时候张佳玮不太会去做攻略。往往是去到当地，就吃当地特有的东西。“举个例子，我去捷克的卡罗维发利。许多游客会去当地温泉街最有名的一个法式餐馆吃，我倒乐意去旁边的小店，吃当地的炖肉、面包和啤酒——捷克的啤酒和面包是真的一绝，肉分量极大。世上许多吃的都这样：最堂皇的饮食，容易千篇一律，最当地的普通馆子，吃得出差异。”

“我对吃的要求不太高。我是觉得饿了，什么都好吃；渴了，什么都好喝。……大概我比较喜欢味道扎实有趣的，讨厌花里胡哨为了排列食材炫耀技艺的吃食。”张佳玮原来就没有忌口，出国之后，他越发意识到好吃的东西所在多有，只要放开，什么都好吃。“在无锡时还是喜欢软香甜糯的，当了重庆女婿就更能接受精

细复杂的调味和江湖菜风味了，到欧洲后就真的无所不吃了。”

在味觉的探索上，张佳玮喜欢挑战和冒险。“我自己就经常尝试奇怪的搭配，比如豆浆配味增来作为面汤底，比如鸭油炒鳕鱼之类。时不常做点类似的黑暗料理试验是下厨的的大乐趣。”

写每一个地方的美食，总会带出一个地方的文化。“一个19世纪英国人吃的（份量），够六个希腊人吃的。”张佳玮用法国学者丹纳的这句妙语来解释两者的关系。“希腊人因为在欧洲南方，靠海，温暖，就是吃鱼吃洋葱吃葡萄吃橄榄喝水，相对清淡，所以从雕塑到艺术都追求典雅朴素，喜欢白色。英国人因为在北方，阴冷潮湿，所以吃大量糕点腌肉薯条喝烈性酒如威士忌，所以艺术就更重视色彩，更极端，更喜欢黑色。地缘气候决定当地人饮食习惯，也能折射出文化差异来。”

尽管已经出了三本书，对于美食，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个门外汉，“我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懂了，所以我写吃也是没有结论，只有体验。吃的世界太宽广了。”

### “中国人在国外都会练出一手厨艺来”

2007年，女朋友跟张佳玮说毕业后想去巴黎学艺术，希望他一起去。为此他开始攒钱，同时为几家媒体写专栏，并且开始学法语。

2012年9月，张佳玮以“陪读”的名义开始在巴黎游学写作。

作为自由撰稿人，他的生活算是规律的了：

每天早起，写短稿子——公号、专栏、约稿之类。下午有书稿写就写书稿，不写书稿时就看看书打打游戏。

春夏两季原本是巴黎人户外生活的热门时节，今年因为疫情有所改变。3月17日-5月11日，巴黎的“限行令”让街头的行人骤然减少，热衷于BBQ（户外烧烤）的法国人，也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过过瘾。

“在巴黎的好处是，你不用特意适应当地饮食。就像在上海、北京可以吃到五湖四海的东西似的，巴黎也是如此。尤其是巴黎十三区，可以吃到很正宗的烧腊、卤水、川菜和江浙菜。”张佳玮庆幸自己所在的十三区华人众多，“购买食材和叫外卖都还方便”，端午节还能吃上味道不错的粽子。

“遇到中国传统节日时，巴黎华人相当热闹，节庆吃食不提，过年了，巴黎十三区的华人还要舞狮沿店铺庆祝，吃年糕节节高，吃鱼求年年有余。”今年2月份，张佳玮原本打算回国过年，可惜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索性把原定买机票的钱捐给抗疫公益活动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给大家添麻烦了”。

NBA从今年3月12日停赛至今，张佳玮把原本用于看球的时间投入到读书上。

吃东西没忌口，读书也不怎么挑。“吃东西，甜的吃多了想吃咸的，冷的吃多了想吃热的，讲究个互相调剂搭配。读书也是。一段时候大闷书读累了，就想读点轻快的。像我这几天就是，白天有精神时稍微读点布鲁姆的论述，读累了就换本卡尔维诺的《马科瓦尔多系列》这种轻松的小说读读，到晚上就乐意看漫画了——樱井宽老师的《铁道便当之旅》。”他喜欢重复阅读，“许多东西记得住，大概也是重读多了的缘故吧。”

对自己的生活，他不去设定目标。“现在偶尔回看2006年自己写的东西，当时完全料不到十年后移动互联网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同理，我现在也想象不出来2034年世界的样子。那么所谓短期与长期计划，也没什么意义。今年我们也看到了，人生规划得再周全，也赶不上意



图/受访者提供

外的变化。那就每天做好自己就是了。”

巴黎“限行令”解除后，张佳玮第一次出门便去了菜市场，买了些新鲜蔬菜，买了些奶酪、桃子酱、牛肉和酱油。

“中国人在国外都会练出一手厨艺来。”来自重庆的女朋友如今已升级为他的太太，虽然他来自无锡，两人口味却不违和。“做饭分工是一半对一半。我炒和炖比较好，所以炒饭、炒蔬菜、宫保鸡丁、鱼头汤、红烧肉、咖喱牛肉之类就我来；我太太调味和刀工比我好得多，所以做汤锅、弄甜品，甚至复杂如片皮鸭，就是她来。当然也经常配合：她备菜调味，我负责掌勺。”

张佳玮上一次回国是2019年8月，因为疫情，他不确定下一次是什么时候。能确定的是，“如果回无锡，第一顿一定是馄饨和小笼包；回到重庆，一定是机场附近的豌杂小面——我们都叫那里‘机豌’，每次机舱里一说要吃‘机豌’，重庆的诸位都是群情振奋啊。”

# 不聚会 少出门

## 外出做好防护



戴口罩



勤洗手



不扎堆



打喷嚏遮口鼻



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从1977年至1981年,张德英连续三次随中国队出征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34届至第36届),获得了3枚团体冠军金牌和2枚女子双打冠军金牌

## 乒乓世界冠军的知青岁月

“我是上海知青张德英,1966年曾荣获全国少年冠军。看了你们在31届世乒赛的电影,我很激动和难过,只能说我想打球”

口述 张德英 采写 金大陆 吴四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在当代中国,没有其他体育运动能像乒乓那样,承载着如此多珍贵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常读常新,如“乒乓外交”在今天来看就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被徐寅生称为“乒乓球世界冠军摇篮”的上海,从1953年第20至2018年第54届世乒赛,为国家队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主力队员。上海通志馆与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为21位老中青上海乒乓名将做了口述史,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印证,是这些故事的一个母题。

本文节选的是“知青冠军”张德英的故事。1953年生的张德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青,1974年代表黑龙江省女队夺得全国锦标赛团体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她是第34、35、36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队员,两获女双世界冠军,曾任上海乒乓球队教练,后创办张德英乒乓球培训中心。文中,张德英回顾了自己的乒乓与知青经历交集的岁月,以及其拼搏的一生如何体现她所理解的“精神与命运”的关系。

## 知青记忆

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我正在静安区常德路小学读书。那时学校的球台不太好，但我打球的劲头很足，一放学就去打，有时回家后还到附近小菜场的板台上打；平时则喜欢看别人打球，小学老师也指点一下，总的来说是自然学的。

1964年，上海市少体校招生，记得是在黄浦体育馆测试选拔的，我穿的是塑料鞋，水泥地很滑，我索性就脱了鞋子，赤脚上场了。也许招考的老师看我有股劲，打球的灵敏性也不错，就选了我。进队以后是池惠芳教练带我的，因为进行了正规训练，进步很快，成绩也蛮好。这时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的事迹已为万众景仰和追捧。我就把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等世界冠军的照片挂在床前激励自己。我是典型的左推右攻正胶打法。1966年我14岁，池指导带队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比赛，我和徐剑琴、邵培珍组成的混合组拿了全国团体冠军。周总理给我们颁发奖状，我们真是又激动又高兴。

正当我打球技术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少体校也停止了训练，乒乓馆的大门关闭了，没有球打了，我很伤心。但我确实喜欢打球，就约了队友王家麟，从窗户里爬进去，那时人比较瘦小。而且我们还随身带着电灯泡的，因为球馆里面的灯泡都被卸掉了。打完后我们再从窗户翻出来。那时，我和王嘉林还骑着一辆自行车，要么他带我，要么我带他，



到处约人“打野球”。记得我们曾去上海音乐学院打过一次比赛。

不久，“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人，还说有打乒乓球的地方，而且兵团还有工资，我便决定去了。市少体校有三十几个人报了名，乒乓球队的只有我去了黑龙江兵团，还有一个人去了江西。那天，同学帮忙弄了辆黄鱼车，把我在市少体校宿舍的行李运回家中，我还从车上摔了下来。走的时候很多人都到火车站送行，我们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听着高音喇叭里“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去”的歌曲，踏上了赴北大荒的征途。

整整坐了三天的火车，我们到了兵团所在地，举目望去，没有房子，只有几顶帐篷，带队的说今天晚上行李都堆在外面，人在帐篷里休息。但没办法躺下，大家就是背靠背地凑合着睡。第二天，因为人多不够住，又搭了些帐篷，包括厨房、厕所等。我们去的时候是4月份，冰雪刚刚开始融化。第一份工作是装卸工，就是到火车站去装卸煤、木头、面粉等。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火车是晚上来的，哨子一响，我们就集合上工。那时也没什么机械化的工具，主要靠双手搬上卸下。50斤一袋的面粉还算好的，最难搞的是煤炭，我们先要用铁锹铲到筐子里，再抬到堆场去。水也不够，每天除了刷牙一杯水外，洗脸是用冰融化的水，含有不少泥沙，毛巾、被沿都是黑乎乎的。更难受的有虱子，搞得全身发痒。冰天雪地里，只能吃馒头，菜就是大白菜加个汤。上个厕所，屁股会被冻僵。

记得第一次收到上海来信，晚饭后，大家纷纷上铺打开手电，看自己的家书。不知谁看着看着“妈啊，妈啊”地哭了起来，紧接着又一个哭了起来，十多岁的姑娘哪经得起这种情绪的渲染，全屋的人哭得像个合唱。后来连长找到我，责怪我带头哭，我是不承认的，因为确实不是我带的头。

1960年代，张德英（后排左二）和刘萍、高爱莉等队友在上海市青少年体校门口合影 图/刘萍提供

要说打球，睡的都是帐篷，通铺之间的通道非常窄，连吃饭的台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打球呢？后来逐渐好些了，砖头房子造起来了。就这么过了大半年，我爸爸生病了，我挺着急的，总觉得在这里待不下去，就想走人。我请了假，背着两个旅行袋打算回上海。巧的是同车来的一个上海小姑娘，她妈妈也生病了，我们二人就一同上路了。我们先乘车到哈尔滨，再乘车到大连，那时知青基本上都不买票，我也如此，遇到查票的就躲到厕所，把门插上，或是开始查票时，车正好进站了，我就从一扇门下车，再从他们身后的门上来，跟查票的人兜起了圈子。哈尔滨是大站，查得严，我就在前面的一个小站下车。同行的小姑娘是小业主出身，比较怕事，到了哈尔滨就不敢再走了。我反正一门心思要走的，在大连买了张9块钱五等舱的船票回到了上海。

此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又不想再回去。听说崇明有农场，我就过去打听，但因自己的关系已转到外地，人家怎么能收呢？实在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又回到了连队。这下好了，兵团战士“临阵脱逃”，连队两百多人开会批斗我，逼我做检查。我只得照当时的政治口径说犯错误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扎根



边疆的意志不坚定”等，最后落了个警告处分。后来连长叫我在下大田和烧炉子两个活中二选一，我选了后者，即一个人负责烧七个炉子，没想到这一烧就是一年。烧炉子就是用两个箩筐一根扁担铲煤挑煤，再加上铲煤灰清炉子，周而复始。夏天不烧炉子，就到食堂扛面粉袋，和面做饭，我包饺子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 我想打球，我要打进国家队

第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师部放露天电影，我拿着小板凳，坐在冰天雪地里看完了这部纪录片。在电影里，我看到了徐寅生、李富荣等上海籍运动员，我是边看边流泪。回到照相馆的小木屋，我点亮蜡烛，拿出从上海带到黑龙江的乒乓球板。或许是感到前途渺茫，或许是出于对乒乓球的情结，我倚在窗前，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之后我鼓足勇气，拿出信纸，含着热泪给徐寅生写了一封信。现在我还记得信的大意是：

尊敬的徐指导：

我是上海知青张德英，现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曾荣获全国少年冠军。看了你们在31届世乒赛的电影，我很激动和难过，只能说我想打球。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关注我一下。

信是发出去了，但没回音。后来徐主任说他没收到，收到的话肯定是要回的。第31届世乒赛后，各项体育活动都开始逐步恢复起来，我们师部与当地县里搞了乒乓球比赛，我也报了名。当时拍的照片我还保留着，木制的乒乓台凹凸不平，尽管条件不好，但气氛非常热烈。最后我与黄浦区原少体校的一名队员决冠亚军，我获得兵团的女子第一名。男子第一名是打削球的王昉，他后来也进入黑龙江队当陪练。现场的观众起哄说让男冠军与女冠军打一场，我还赢了他。

给国家队徐寅生的信没有回音，我就又给

张德英下乡来到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务农，图为她在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师部照相馆工作时的留影



1976年4月25日至5月7日,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平壤举行。中国选手张立和张德英分获女子单打冠亚军。图为中国女队的合影(左一为张德英)

省队写了封信,先自我介绍是上海知青,现在在建设兵团一师,原来得过全国女子少年比赛团体冠军。省里接到我的信后就来联系了。因妈妈生病要回家一趟,我就顺道去了哈尔滨,跑到省队的训练馆。记得我是穿着北方的那种大皮靴进去的,而且当场试打了,省队教练一看不不错,就决定要我,让我回去等消息。其实,此刻心里蛮慌的,因为有过想回上海农场的“前科”。兵团是属于沈阳军区管的,当时沈阳部队也有球队,但不是十分专业,当知道省队要调我后,是否会放我走呢?

调令下来了,果然师里不放过我。但我铁了心要去省队打球,于是那晚我敲响了师长家的门,师长不在家,我就跪求他的爱人让她说服师长放我走,说我不想去当兵,只想到省里打球。师长老婆看我如此渴求,心软了,当着我的面给师长打了电话。第二天,我整理好行李,师长叫了部车,我拿了自己的档案材料,跟谁都没打招呼,只是和师长道了谢,就钻进了吉普车,车子飞也似的开走了。

我到了哈尔滨,进了黑龙江省队。我非常感谢看中我的那位教练,进队后他对我说,那天你穿着翻毛大皮靴,都能把我们省队的队员打败,我没有理由不要你。这样,经历了六七

年的波折后,我重新开始了乒乓球的正规训练。

尽管我的岁数大了一点,但不久我就得了全省的冠军,接着代表黑龙江省赴京参加1972年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我赢了梁丽珍,进入前八名,获得单打第三名,前八名里就我是一个是来自省队的。梁丽珍对别人说,这个黑龙江人,东打一个,西划一个,不知往哪里打,像个土八路。有人跟梁丽珍说,她是上海人,是上海知青。我的目标不只是在省队拿一份工资打打球,我是立志要进国家队的。目标一旦确定了,我真是万般珍惜现在的机会,训练非常自觉,绝对刻苦。我练出的正手高抛发球,至今没人超过我。早上跟篮球队一起跑步,人家跑得多快啊,但我内心里响着的声音就是“我要进国家队,我要进国家队”,信念的力量支撑着硬是不落下。黑龙江冰天雪地,一路跑下来口罩、眉毛都是白糊糊的冰碴。我还在小腿绑着沙袋做蛙跳,让自己的步法更轻灵。人家礼拜天休息,我加班打球,而且还专找男队员练。有一段时间,我的推挡不太好,此时韩玉珍主

动提出帮我练，我当然求之不得，推挡是她的强项啊。谁知她凌晨四五点钟就来敲我的门，那就练吧，反正我是拼了，满脑子就是尽快提高球技，早日进国家队。这一拼就是三年。

## “借调生”

1974年，我们黑龙江队在南宁得了全国冠军，我是一路横扫对手，这在黑龙江乒乓运动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后来我还到男队训练，其中有一位教练是孔令辉的父亲。我想，这下可以进国家队了吧？但好久也没有什么信息。打听后得知对我进国家队是有些争议的，主要认为我的年龄有些大了。我心想自己已经拼到这个程度，因年龄问题这个客观存在的情况进不了国家队，又不是因为主观不努力、技术水平差。这个打击是很严重的，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你们不要我，那我不打了！甚至做了退役的打算，因为通向最高台阶的门被一个我无法改变的原因卡住了。真没想到，此时省体委和教练找我谈话了，说是刚刚接到国家队的借调函，借我去欧洲参加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我一听，霍地站起身说：机会来了！

1975年10月，就在出国比赛前的一两周，国家队组织集训了。人家借调是轻装简出，我索性把行李统统搬进了国家队。我想，要是成绩不过硬，国家队不要我，我就直接回老家上海，何谈再回省队呢！一同去的辽宁队的隋建莹、李明、刘新艳都是国家队队员，已经在国家队好多年了。当时国家队分一队和二队，我在二队集训。去欧洲比赛的第一站在南斯拉夫，因出国了上街穿的是高跟鞋，像我这种常年穿运动鞋的人怎么能适应呢？结果在过马路时，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脚当场肿了起来，痛得直冒冷汗，鞋子也穿不进去，严重到只得去医院诊治。第二天的比赛怎么办？我深知自己已没有退路了，此时也容不得多想，我全然不顾，坚持上场，咬着牙拼尽全力把比赛打完，并且一场没输。下场后，我的嘴唇都咬出了血，腿上乌青。和我一起出访的队友隋建莹说，张德英，我算服你了！我发自内心地说，我和你们不一



1981年，张德英手捧第36届世乒赛女子双打冠军奖杯凯旋而归

样啊！我打不好就要回北京拿包走人啦。此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比赛中，总共28场球，我又是全胜。大概是因为成绩显著和精神向上吧，我正式进了国家队。

## 精神与命运

1976年，我作为国家队队员准备参加在朝鲜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出发前，我骑车去北京火车站送焦志敏的姐姐回黑龙江，因下雪天路上结冰，在崇文门附近车子打滑，我被摔了下来，只能推着自行车到医院治疗。结果关节严重扭伤，韧带也坏了，手臂肿得衣服都穿不了。近期不好练球了，急也没用，我就在房间内拿板颠球。

我从市少体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前摔了一跤，打斯堪的纳维亚赛前摔了一跤，现在打亚洲锦标赛前又摔了一跤。但每次摔跤，我都没有“摔倒”，好像摔掉了坏的东西，留下的就是好的事情，反而更加向前了。人往往就

靠着一股精神，这才真正叫苦尽甘来。尽管两个礼拜没上台练球，我在正式赛场上仍旧一场没输。如果说参加瑞典斯堪的纳维亚的比赛，是通过欧洲对手关，那么这次就是通过亚洲比赛关。欧亚的考验都合格了，我终于成为国家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

1977年，我正式进入国家队团体赛的阵容，参加了在英国伯明翰举办的第34届世乒赛。在团体赛的关键场次中，我出战朝鲜队、日本队、韩国队，共打了4盘单打、3盘双打，皆以2:0获胜，这在我的乒乓人生中是很重要的一章。颁奖仪式上，我激动得落泪了，内心非常感慨：“文革”三年，兵团三年，在省队又是三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啊！我脑海里像过电影般，闪过一连串自己在装卸、在筑路、在烧炉子的镜头，现在终于站在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1975年，第33届世乒赛后，全国搞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乒乓队也整天开会、写大字报等。记得国家队还一度被下放到北京光华木材厂。你还别说，打球不累，倒是开会坐着屁股疼。所以通知我去开会，我就尽量敷衍，我知道进国家队不易，就是一门心思练球。训练之余，最好的休息方法就是看书。在国家队中，我是看书比较多的，尤其喜欢看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读物，如《拿破仑传》《第三帝国的兴亡》《武则天》等。晚上10点熄灯以后睡不着，就拿着手电筒看，从中

提炼和领悟为我所需的思想层面的东西，以及精神与命运的关系。不是说我进国家队时岁数算大了吗？如何站住脚、如何获得世界冠军，一方面是靠刻苦训练，另一方面就是想从书中汲取知识的力量。我总觉得，人是要有股精神来支撑的，只有如此，你才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才会时刻保持旺盛的斗志。

我在国家队从1975年到1981年一共待了七年，打了三届世锦赛，退役时28岁。

退役前，我世界排名第一，起初队里还想叫我打双打，但我毕竟已28岁了。1981年底，全国比赛在河北石家庄开战，国家队队员全部回省参赛，最后是黑龙江队与上海队争冠亚军。我跟队里说了，与上海队交手，我不上场。但教练非要我上，焦志敏是我带出来的，此时也“拎不清”地劝我上。结果我还是让掉了，对此焦志敏一个劲地哭，其他人也怨三怨四的。我说，可以了，黑龙江队冠军拿过了，第三名也拿过了，这次拿个第二名，就全了。我说不要上，你们都不听，怎么办呢？她们不响了。赛后我就调回上海了，领队责怪我不早说。可这事怎么能早说呢？能干自己老本行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我就在上海队任教练，带一批小选手。人的一生总是曲曲折折，就是要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实现自己每一阶段的人生规划。说实在的，我当初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三部曲”：第一，打进国家队；第二，入党；第三，回故乡上海。我当初的规划全都终于实现了。

我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我是上海的女儿。拼搏了一生，有艰难，也有辉煌，我这辈子值了。▲

（节选自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文章有删改。）

（图片来源：张德英本人，部分来自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



2018年5月12日，上海市老知青乒乓球比赛发起者张德英与当年黑龙江农场乒乓球队队友顾伟民（原上海市乒乓球传统学校风华中学乒乓球教练）在比赛馆内合影 图/王於竞提供

在路上 ON THE ROAD

# SUPPLEMENT 后窗



鹿特丹地标建筑方块屋

## 鹿特丹，全世界的港口

图、文 鱼尔布开克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Monique 是我读书时在湖南旅行认识的朋友，她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柬埔寨人，出生在鹿特丹，也一直在那里生活。她曾对我说过，如果你想认识真正的荷兰，就要来鹿特丹看一看。就是因为这句话，我毫不犹豫地将第二次来到荷兰的首个目的地定为鹿特丹。

抵达鹿特丹的第二天，我在一家酒店的 Cafe 见到了 Monique。这家 Cafe 位于新马斯河河畔的一座大厦的高层，视野非常好，眼前就是连接鹿特丹南北的伊拉斯谟桥（Erasmusbrug）。这座桥以尼德兰中世纪哲学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名字命名，由于其弯曲的桥塔，这座桥也被称为“天鹅桥”，算得上是鹿特丹的地标之一。或



### TIPS

- Cool District 街区非常多元化，各国美食齐全、夜生活丰富，如果第一次来到鹿特丹可以考虑预定附近的住宿；
- 个人感觉鹿特丹的各处景点相隔较远，靠纯粹步行游览比较困难，建议购买交通通票；市内交通通票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直接搭地铁前往海牙，比从其他城市乘火车更便宜、方便



在海事博物馆顶楼露台“港口”忙碌的小朋友

许是由于近日来一直游荡在欧洲的“小城镇”，甚至没有见到什么划破天际线的建筑，而在这里，俯瞰鹿特丹全城和面前的斜拉索桥，让我感到一种别样的开阔感和包容感。

我们聊起了湖南旅行分别之后彼此的生活，聊到了我的旅行，也聊到了她对鹿特丹这座城市的感情。在她看来，这座城市有一种积极的包容：这种包容并不是像美国那样仅仅默认各个族群的存在却又使彼此“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像拼图一样把所有消极地“拼接”在一起；鹿特丹的包容是融合的，它鼓励在这座城市生

活的所有人互通有无，这也如同它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连接起全世界的港口。鹿特丹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如今也是欧洲最大的港口，得益于马斯河与莱茵河，它成了远洋货物进出欧洲的大门。

即使不是 Monique 提起，在来到鹿特丹的前两天，我也已经对这里的开放刮目相看。我住在一个十分“土绅化”的街区，地图上甚至直接标示这里为 Cool District，仅在我住的这条街道上，就可以找到中东烤肉、中餐（甚至区分广东菜和川菜）、日式定食、拉面店、美式酒吧和汉堡店、夏威夷风味餐厅，甚至连冰淇淋店都分成了主打传统意大利式的、美式的和融合风格的。而我住的旅馆的前台工作人员就是一位出生在鹿特丹的华裔女孩，街上往来的人们肤色各异，一时间让人想不起来自己身处哪个国家……

Monique 还向我推荐了位于我们正对着的河岸上的世界博物馆（Wereldmuseum），如果不是她说起我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原来真的会有一座博物馆将自己的收藏视角放在整个“世界”。告别 Monique，我来到这座博物馆，发现它并不是按照国家来划分收藏的，而是以一种世界“民族”的人类学视角策划展览。与此同时，在另一间博物馆里，我也见识到了港口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海事博物馆（Maritime Museum）通过多种媒介和模拟体验向人们介绍着海港的日常工作方式和鹿特丹作为港口的历史，在顶楼的露台上，还有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模拟港口乐园，让孩子们在与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候，了解到这座城市建立的根本。我一方面羡慕荷兰教育基础设施的完善，另一方面也不由得感慨，生活在这样开放包容的城市，本来就是一种无形的“素质教育”。

这时我才真正明白 Monique 的话的含义，曾经我以为是阿姆斯特丹的现代冒险精神塑造了荷兰，但其实更重要的，是鹿特丹所展现出的开放。离开鹿特丹的时候，我再次给 Monique 发了消息：未来某一天，我们一定还会在这个世界的其他角落见面的。

有些乐队  
刚入  
初  
复  
有些乐队  
已经在  
过  
秋



我游在回声里  
坠入了云的泥  
你不经我的意  
是此是彼

ALIAS  
重塑雕像的  
WHEN THE RAIN IS COMING  
当雨满飘落 喧嚣四起  
ACROSS ALL THE DIFFERENCES  
想要无视所有的污蔑  
I HATE MY INDECISION  
我讨厌自己犹不决

上周六晚，乐迷们千呼万唤、差点被拖成“乐队的秋天”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终于开播了。如网传的 33 支参赛乐队，这次乐队年龄跨度之大该怎么形容呢？实事求是地说，有些老乐队在上世纪 90 年代成立时，新乐队的孩子们还没出生……前者包括野孩子、达达乐队、木马乐队、声音玩具等，不一而足。凭着资历老、圈内知名度高的优势，这些乐队在初秀前首次互投时，几乎毫无疑问地占据了票选 TOP5 的所有位置：后海大鲨鱼、重塑雕像的权力、Joyside、木马、野孩子、马赛克（后两者并列第五）。而那些新乐队的名字，大家提起来多半是无知三连——没听过，不知道，干啥的？

可开场后，我们彻底惊了。老乐队有的感觉平平，有的音乐风格还停留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流行曲式——正如水木年华在后采时承认的“就是过气了”

文久童  
编辑 杨静如  
twzhouchuang@126.com



青春再见  
水木年华

留不住什么，换不回什么  
青春终究要散场  
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  
生命终究要告别



IN THE RIVER

的权利

ING A RUMOR IS SPREADING

RENT ROILY SOUND

SO AS I LOVE IT  
她又对此自我满足



旁观娱乐 ENTERTAINMENT  
SUPPLEMENT 后窗

木马乐队  
成之王

大象没有眼泪  
可是却想要流泪  
我们没有解药  
只好猛喝糖浆



玉珍 福禄寿 Florvil Show

她的茉莉花我还在唱着  
她听的歌我还在唱着呢

直到她的苦衷变成了我的  
她的仁慈也变成我的了



自己的音乐。  
最能诠释这点的无疑是 Hyperslash 超级斩。这个极其二次元的乐队，每次亮相都让人联想到各种热血日漫，酷爱设计动态手势加上拟声词。而他们的音乐大概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炸裂”。毫不夸张，是字面意思上的炸裂——现场听“超级斩”，哪怕你坐在百米开外，桌椅都是震的。他们的音乐让人永远跟不上自己的预期：清唱开场，似乎柔情，要出旋律了吗？然而转头就是一声硬核嗓闷声狠敲你的脑袋。他们在台上肆无忌惮地跳跃嘶吼，又腰踏在音箱上，仿佛站在宇宙之巅，势在必得地要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

吧”，有的发挥一如既往的牛 B 却并没有超出人们对他们的既有认知。而与此同时，给人音乐上的惊喜感、具备实验性、既凭技术也凭情感征服我们的，却正是那些我们之前一无所知的新乐队。

福禄寿、Mandarin、超级斩，这三支成员平均年龄为 25 岁的年轻乐队，各自在舞台上展现了独特的气质和青年代际的巨大能量。“福禄寿”是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幼儿园一路读到研究生的 90 后三胞胎姐妹，正经音乐科班出身，出场一首写给外婆的歌《玉珍》赚得全场眼泪，从编曲创作到乐器运用等各方面都有出人意料之处。本是一首低沉感伤之歌，却在“起风啦”这句高亢声嗓中加入了苍凉、悲怆和悠远，仿佛对天长啸——很难相信这竟然出自三个年仅 25 岁的姑娘。

年轻一代的音乐只有“小清新”“小确幸”和抖音神曲吗？听到福禄寿，我的第一反应是庆幸：音乐并没有像那些固执的老辈所说的在一天天沉沦和肤浅下去，新一代人，又在新的成长背景下生发出了属于

有人用“疯癫”来形容女主唱“酸”的能量，褒贬不论，但我确实感到了羡慕。艺术不就是在散发能量吗？再过五年十年，恐怕连“酸”自己回看这段表演视频都会觉得恍如隔世，然后感慨：“岁月不饶人啊。”不是不想，是真的体力跟不上。何况，这种能量，真实地只能在年轻人身上寻得——它初生牛

HYPER SLASH 超级斩  
Monopoly



DANCING  
把骰子甩出去，我们会得到  
JUST LET US ENI  
尽情

犊不怕虎，它莽撞而青涩，它直面南墙也要硬撞，而且以头破血流为年轻的勋章。这是年轻的资本，甚至在年轻人身上都非常罕见。

但超级斩一定不会受所有人喜欢，对于他们，上一辈音乐人更多像是在宽容：那个躁动的充满荷尔蒙的年代我们也经历过，你们不过是换了种二次元的形式，我们不懂，也不觉得多好听，但我们尊重。

可对于另一支三人乐队 Mandarin（普通人），音乐老炮儿的态度完全变成了：“我靠这真TM是后浪！再不跑是真要被拍死在沙滩啊！”Mandarin 很酷。三个分别生于 1990、1994 和 1998 年的男孩，在专业领域各有近乎天才的表现：主唱 Chace 年纪最小，但已经是音乐制作人，声乐、乐器、编曲、混缩样样全能；鼓手安雨在打鼓圈内“可以说是最好的”；吉他手肖骏则是国内少有的爵士吉他手。三人都曾和国际大师合作，也都是科班出身，音乐

有如其人的迷离和捉摸不定。“前浪”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巨大的可能性和潜力，如乐评人张亚东所说，这个去年刚刚成立的乐队，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

但在新乐队大放异彩之时，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年轻的音乐，都像是从录音室、从中产家庭的房间、从网络空间生长出来的音乐。新一代音乐人迎来了更优渥的经济条件、更宽容开放的环境、更国际化的音乐审美、更前沿的技巧，然而，那些从市井街头、从泥土田垄上沾染的本土气息，无可挽回地正在一点一点地离我们远去。哪怕仅仅为了这个，第一场任性临场换歌、惨遭淘汰的五条人也显得格外珍贵。

五条人真的是让我在现场把肚子笑痛的乐队，油腻市井中带着股天真的可爱，最搞笑的是听说他接受某自媒体采访，聊到最后记者小姐姐发现时间没用完又不知道再聊啥，空气中飘着一丝淡淡的尴尬时，那哥们说：“妹妹，你会找到更好的工作的。”

但“老油条”如五条人，怎么会轻易离开人们的视线？我有预感，他们会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观众眼前，博得众人欢颜，然后潇洒离场。

不为别的，因为他们是五条人，因为乐队的夏天，才刚刚开幕。



# 独具匠心

## 设计小清新



我们把「未知」作为理性思考的代表，诚恳地印在包上。

「未读」书籍里的智慧，「未知」哲理的思索。

你需要一份理性的自我空间。

在人人必须跟随潮流的时代，

重磅新闻必须「已知」，微信消息必须「已读」，



扫码即可购买

## 《三十而已》 中产阶层焦虑和独立女性幻梦

文 叶倩雯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三位背景不同、出身各异的三十岁女性如何在上海这座浮华都市完成自己的成长，这是热门电视剧《三十而已》的核心命题。该剧以长期以来附加在女性身上的年龄焦虑作为卖点，一经播出就引发了各种讨论。

不论是努力实现阶层跃升、还要照顾丈夫孩子的全职中产主妇顾佳；还是已婚未育、拒绝成长的上海本地普通白领钟晓芹；还是外地来沪打拼、野心满满的王漫妮，都各对应着某一类当下都市女性的自况和自我期待。

### 对 30+ 女性的高要求制造了新焦虑

这三位女性尽管都面对着生活里的具体困境，但是她们拥有不俗的容貌和身材，有着超出收入的消费能力，还不至于缺乏优质帅气的男性追求者。所谓的独立背后全是为了迎合主流价值观付出的努力，从这点来看，这部剧的立意和大热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谋而合。

“又美有飒”是当下舆论对 30+ 女性形象的塑造，尽管这未必符合现实情况，但事实上制造出了一个都市女性的新样板，继而成为一种需求。这种要求是全方面的，既有容貌上的，也有才能上的，更考验一个人的经济实力。因此这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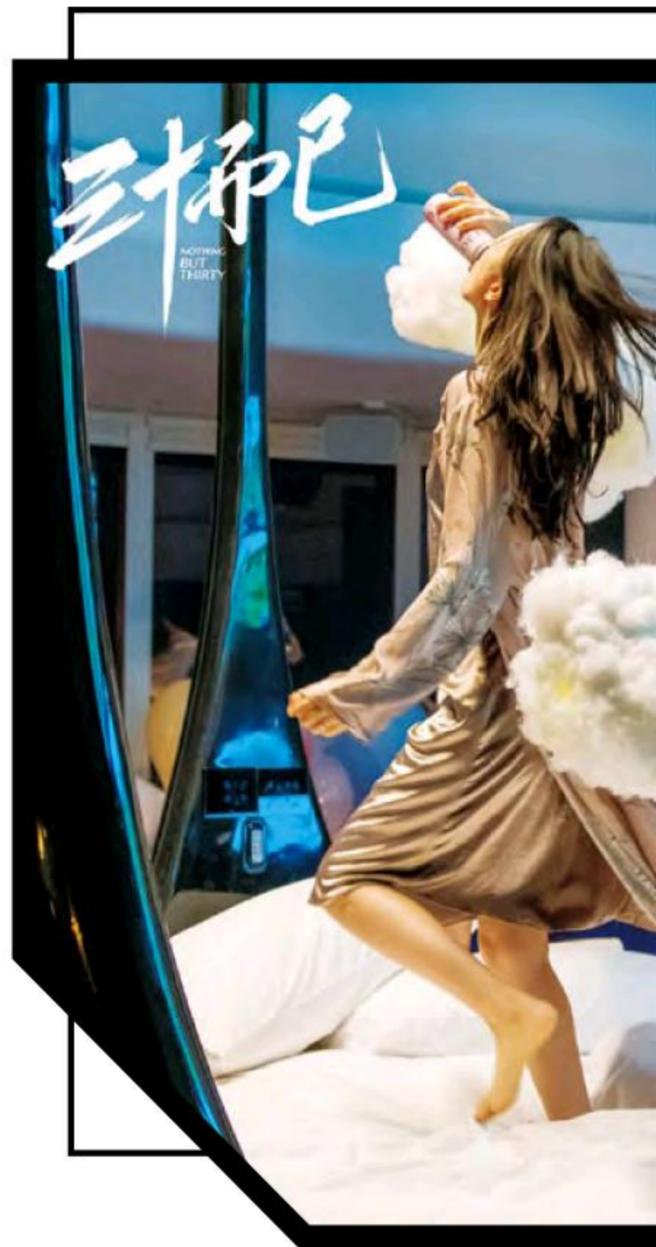
电视剧看上去主打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独立，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尺却还是消费能力。

剧中数次展示三位主角通过消费来完成自己的成长，顾佳需要一个爱马仕才可以进入上流社会，钟晓芹要通过购物完成自己的蜕变，而王漫妮则需要游轮上升舱来激励自己奋斗……

因此有人说，看了这部电视剧，感觉更加焦虑了，而这种焦虑正是《三十而已》获得关注的法宝之一。电视剧口口声声反抗着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规训，宣扬三十岁的女人依然美好，但展现的却是三十岁的女性为了适应这种规训而对自己提出近乎严苛的要求，不敢有丝毫松懈。因此，剧中的女性追求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她们的追求是要让自己看上去像 20 岁，消费力达到 40 岁，还要拥有一位与之匹配的如意郎君。

### 女性独立的背后是父权制阴影

相较于事业成长线，爱情线是这部电视剧最重要的部分。目前来看，电视剧将市面上各种婚恋的样态都安排给了自己的女主角们。顾佳是辅佐丈夫的贤妻，她不仅在生活





上照顾丈夫孩子，还是家庭收入事实上的贡献者。

表面上看，她维护的是家庭的幸福和完整，骨子里她需要的是自己的丈夫作为“许总”来维护这个家庭在社会中的位置，她不顾自己的实力也要送孩子上名校、进入“太太圈”，用辅佐丈夫的成功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心。不仅如此，她还需要和觊觎丈夫的女孩斗智斗勇……这一路下来，顾佳的生活根本不是中产主妇，而是后宫娘娘。

至于王漫妮，她的名字就是“want money”的谐音，所以求仁得仁认识了有钱的男友梁正贤，也由此展开了一场男方要给女方花钱，女方拒绝但要求名分，男方只好给女方花更多钱的戏码……直到真相揭开，梁正贤的香港女友摊牌，以傲慢的姿态处置了“僭越”的王漫妮，后者才恍然大悟……有趣的是，揭开真相的方式是一张梁正贤的信用

卡，两个女人斗争的根本在是否可以合理使用男人的财产，这个逻辑不过又是一出宫斗剧戏码的变体而已。

也许只有钟晓芹这条线更具真实性，她因为种种矛盾和丈夫离婚，同时又被公司的“小奶狗”追求，在两段关系里徘徊不前。她的选择似乎无关乎男性的财产，而关乎男性是否可以满足自己的情绪要求，给予无处不在的关心。

可以说，《三十而已》尽管炒作“独立女性”的议题，但其内核却是挥之不去的父权制的阴影。在《三十而已》的丛林法则中，丈夫和男友的实力才是决定了女性眼界和地位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拥有这些，那就只能提供情绪价值来满足女性的要求。《三十而已》的爱情不承载心灵相惜、灵魂沟通等形而上的功能，是一种事实上的实用主义。

### “欲望大厦”：建造的社会阶级的模型

值得玩味的还在于电视剧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社会阶级的模型：三位女主角的生活都与上海核心地段的一幢大楼有关系，顾佳是其中的业主，居住在大楼的中间楼层；钟晓芹是这幢大楼的物业，工作就是服务业主；王漫妮是一楼某家奢侈品店的店员，随时都有可能失业……而在大楼的顶层，则居住着阶层更高的王太太等人，正是她们决定着这幢大楼的运行法则。

这种设定和韩国电影《寄生虫》有类似的功效，不同的是，《三十而已》并没有过多质疑这种社会分层的不合理，主角都在不同程度迎合着这种社会制度，并以各自的方式在大楼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管是安于现状还是野心勃勃，三位女主就是无法离开这幢层级分明的欲望大厦，她们所谓的独立只是期待自己在大楼里的位置更加稳固，最好还能跃升，却忘记了即便是大楼顶层的王太太，她的背后也隐身着代表财富和权力的丈夫，哪里来的真正独立呢？

当然，笔者做了如上的批评和分析并不是说这部电视剧不值得一看，恰恰相反，我们的确可以在《三十而已》中看见一个曲折的自我，剧中所有的不合理之处并非空中楼阁，它是现实生活价值观的折射，照出我们这个时代畸形的欲望和社会法则对人的异化。

